

## 1950年代臺灣的日本出版品進口談判

林果顯

### 摘要

為了確保生存，1950年代中華民國政府對內外進行諸多管制措施，承載大量資訊的外來出版品成為主要管制進口對象之一。其中，日本出版品涉及前殖民母國語言，內含大量左派資訊，政府採取嚴格管制措施，卻又因同為冷戰盟友身分，引來日本抗議。因此，1950年代日本出版品進口管制措施看似內政治理事項，實有來自外交上的壓力。本文主要探究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政府對此如何談判折衝？雙方主導政策及參與談判的人員為哪些人？並進一步論述雙方何以此時願意進行談判，從而改變戰後臺灣的日本出版品進口政策？

本文指出日本基於其國內政治情勢及知識脈絡，對出版品問題有自身的想像與理由。而中華民國政府希望透過出版品等文化議題，略為開放市場以示交流成果，目的仍在於宣傳與壯大反共力量。在政治脈絡上，1950年代中期，為了角逐自由民主黨總裁，日本眾議員石井光次郎領軍，率領其智庫國策研究會成員來臺，促成了1950年代中期的談判，鬆動了部分限制，但對彼此的需求也始終無法達成一致，使得日本出版品在解嚴之前，一直未能取得全面性的進口管道。在知識脈絡上，談判成員的要角拓殖大學校長矢部貞治，以言論自由豐富反共思想的信念，以及延續該校至亞洲各地研究的傳統，希望互相了解以促進戰後日本與亞洲各國的關係，反而是少數接近文化交流本質的談判成員。本研究顯示，中華民國政府對日本文化的態度並非全然鐵板一塊，在更高的國家戰略下仍有調整空間，但談判過程顯示雙方看待文化交流仍有濃厚的工具性質，此態度導致進口幅度隨外交關係起伏難以再擴大，也對戰後臺灣的文化風景產生深刻影響。

關鍵詞：日本出版品、進口管制、中日合作策進會、石井光次郎、矢部貞治

# The Negotiation for Importing Japanese Publications to Taiwan in the 1950s

Guo-sian Lin<sup>\*</sup>

## Abstract

To ensure its own survival,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adopted various control measure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ountry in the 1950s. Foreign publications carrying a large amount of unfiltered information became one of the main objects of import control. Among them, Japanese publications contained not only considerable left-wing information but also the language of a former colonial ruler of Taiwan. The government of ROC therefore imposed strict import control on Japanese publications. Japan protested about this for years because the two nations were supposed allies in the Cold War. The import control of Japanese publications in Taiwan may seem to be an internal political matter, but in fact had diplomatic implications. What this paper wants to inquire are the following: How did the ROC government and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negotiate and compromise on this issue? Who were the principal decision makers of this policy and leading participants in the negotiations? Furthermore, why were the two countries willing to negotiate for a change in the import policy of Japanese publications in Taiwan at this time?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Japan had its own views and considerations on the issue of publications due to its domestic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intellectual trend. The ROC government was prepared to open the market only slightly, thus demonstrating its commitment to cultural exchange, but the ultimate goal was still to promote and strengthen the anti-Communist alliance. In the mid-1950s, Japanese congressman Mitsuzirou Ishii, trying to enhance his candidacy for the president of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led members of his think tank, the

---

<sup>\*</sup>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ational Policy Research Association, to Taiwan and initiated the negotiation. The negotiation led to a loosening of some restrictions, but the demands by each side was never fully met. Japanese publications had not been able to enjoy comprehensive import channels in Taiwan before the end of martial law in the 1990s.

A key negotiator on the Japanese side, Takushoku University president Teizi Yabe, believed that freedom of speech would enrich anti-communist ideology. He also wanted to continue the university's tradition of conducting fieldwork throughout Asia, thus improving post-war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other Asian countries through increased mutual understanding. He is one of the few negotiators who truly appreciated the essence of cultural exchange. This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attitude of the ROC government towards Japanese culture was not entirely inflexible, as there was still room for adjustment under a higher national strategy. The negotiation process, however, suggests that both sides tended to emphasize the instrumentality of cultural exchange. This tendency made it difficult for the import volume to avoid the interference of fluctuat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the result of this import control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cultural landscape of post-war Taiwan.

**Keywords:** Japanese Publications, Import Control, The Committee for Promotion of Sino-Japanese Cooperation, Mitsuzirou ISHII, Teizi YABE



# 1950年代臺灣的日本出版品進口談判\*

林果顯\*\*

## 壹、前言

本文的主要提問是：看似內政治理事項的日本出版品進口管制措施，來自外交上的壓力究竟扮演什麼角色？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政府如何談判折衝？雙方主導政策及參與談判的人員為哪些人？更進一步而言，雙方何以此時願意進行談判，改變了戰後臺灣的日本出版品進口政策？

1950年代的中華民國政府為了生存，致力於防堵外來威脅，包括軍事力量、滲透人員，以及危險資訊，原屬文化或媒體領域的出版品進口管制，亦成為國安考量的重要環節。此時的外來訊息以出版品為大宗，中文、英文與日文出版品為主，其中來自日本的出版品不僅可能蘊含違反國策的左派思想，更因涉及對本省籍日文讀者的影響力，使其成為高度政治敏感性的外來資訊。基於此，筆者曾疏

---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1950年代臺灣的日本出版品進口談判」（計畫編號：MOST 105-2410-H-004-066）之研究成果。曾以〈戒嚴時期日本出版品進口談判關鍵人士：以矢部貞治和中日合作策進會文化小組成員為中心〉發表於「走在歷史的關鍵上」學術研討會（臺灣歷史學會主辦，2017年5月21日）。承蒙主持人李筱峰教授、評論人李明峻教授提點鼓勵。本文後續修改期間前往日本研究，受到一橋大學洪郁如教授、早稻田大學若林正丈教授、拓殖大學長谷部茂教授與岩口敬子女士提攜，擴大本文視野，並受日本國會圖書館、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圖書館、眾議院事務局憲政紀念館、出版文化國際交流會等處檔管人員熱心協助，謹此特致謝忱。

收稿日期：2021年9月18日；通過刊登日期：2021年10月28日。

\*\*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理過去較少被提及的戰後臺灣日本出版品管制體系，透過政府檔案，逐步釐清各時期的相關法規與諸政府部門的任務職權。<sup>1</sup>

在深入探討此議題時，有個問題逐漸浮現：這些看似國內的文化管制事項，並非在真空的環境下恣意制訂，由於涉及外國出版品，來自日本的要求屢屢出現在內部討論的公文中。那麼，這些外交壓力何時正式排入雙方政府代表談判的議程？雙方的訴求與攻防過程為何？這些問題若不回答，將無法全面地呈現當時臺灣的文化管制狀態與決策過程。同時，臺日雙方透過什麼機制溝通協調，彼此攻防的重點和底線，也反映了兩國的外交關係與策略。1950年代臺日雙方的關係歷經多重變化，彼此的政府型態、在亞洲冷戰中的定位，以及國家面對的戰略困境，每一階段的難題皆影響兩國之間的往來。兩國之間從無邦交到建交，從定期性的貿易協定會談，進展為官民團體定期互訪開會的形式，日本出版品進口問題便是在此過程中，逐步成為重要議題。換言之，在國內管制體系的研究基礎上，透過臺日雙方的檔案，釐清外國出版品的國際協商面向，即為本文欲達成的首要目的。

其次，在僵硬的法規文字和繁複的會議紀錄背後，有待觀察的是來自兩國不同部門的政府官員與民間人士的運作，特別是日本方面。日本對戰後臺灣具有特殊而敏感的地位，既是必須清理的前殖民者遺緒，卻同時是亞洲反共陣營的伙伴，臺灣的談判代表必須一方面兼顧外交情誼，另一方面堅守管制立場，多半基於職權捍衛發聲，較少個人色彩與需求。反之，日方的主要談判人員卻出身多元，且各有不同考量。日本在1952年脫離美國占領後，積極尋求自己的亞洲政策，試探與蘇聯和中國接觸的方法，此時願意來臺、想要來臺、且對文化事務有所關心的日本人，並非主流。在此過程中，究竟是哪些人、基於什麼目的與臺灣交涉？這也是過去討論國內文化政策時較少碰觸的議題。因此，讓日本出版品政策談判者，特別是日方談判者的面貌浮現，為本文的第二個目的。

綜合以上，本文希望在日本出版品進口政策的研究上，聚焦過去較少被關注的國際因素，並分析參與其中，特別是日方人員背景，使得此研究在既有制度面

---

<sup>1</sup> 林果顯，〈「欲迎還拒」：戰後臺灣日本出版品進口管制體系的建立（1945-1972）〉，《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45期（2016年5月），頁193-250。

的疏理之外，增添更多元而動態的形成過程，並讓文化管制議題能看到臺灣與世界的互動情形。

過去學界對此一問題著墨不多，主要成果在於兩方面，一是對於日本出版品的管制研究；另一則是對於臺日貿易談判的研究。日本出版品問題以何義麟的研究為先驅，他以印刷媒體為中心，勾勒戰後初期臺灣禁用日文的政策內容與變遷。該文關切日本語文在臺灣所可能存在的空間，對於日本出版品的進口管制亦有涉及，可惜僅止於1950年，未及談論中央政府來臺後的管制，以及兩國建交後的協商過程。<sup>2</sup> 林果顯透過黨政軍機構的檔案，補足了1950至1960年代中華民國政府建立日本出版品進口管制體系的過程，有助理解中華民國統治者的態度與法規，但與何氏的研究相同，側重臺灣內部的情況，並未著墨外部談判的部分。而有關1950年代臺日貿易談判的研究，多偏向臺灣如何重建與日本的經濟關係，幾乎未涉及貿易談判中的出版品事項。<sup>3</sup> 與本課題較相關者為「中日合作策進會」的研究，以徐年生、洪紹洋與池井優為代表。徐氏檢視「中日合作策進會」在日華關係上的地位，說明日方促進文化交流和貿易關係改善的企圖，並指出在策進會成立前一年的石井光次郎訪華團，已開始提及日本出版品進口問題，提供本文線索。<sup>4</sup> 洪紹洋則關注策進會在引進日資參與臺灣經建計畫的過程，雖然僅略為提及，亦注意到策進會對於文化事項的討論，而洪氏系統性地整理了策進會十五年的發展梗概，有助於整體性地了解文化事項在此會討論議題中的定位。<sup>5</sup> 池井優詳盡地運用歷屆議事錄與回憶錄，重建策進會每次會議討論過程，並說明該會在兩國關係生變時發揮的作用，補充了國際外交的面向。<sup>6</sup>

<sup>2</sup> 何義麟，〈戰後臺灣禁用日文政策之變遷——以印刷媒體之管理政策與中心〉，收入古川ちかし、林珍雪、川口隆行編著，《日本語在臺灣・韓國・沖繩做了什麼？》（臺北：致良出版社，2008年），頁46-77。

<sup>3</sup> 隅谷三喜男、劉進慶、涂照彥，《台湾の經濟 典型の光と影》（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5年），頁261-312；廖鴻綺，《貿易與政治：臺日間的貿易外交（1950-1961）》（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年）；薛化元總編，《臺灣貿易史》（臺北：外貿協會，2008年），頁242-245。

<sup>4</sup> 徐年生，〈戰後日本の中国政策の模索と日華關係の研究：1950年代を中心に〉（札幌：北海道大學法學研究科博士論文，2007年），頁141-148。

<sup>5</sup> 洪紹洋，〈中日合作策進會對臺灣經濟計畫之促進與發展（1957-1972）〉，《臺灣文獻》，第63卷第3期（2012年9月），頁100-101。

<sup>6</sup> 池井優，〈日華協力委員会：戰後日台關係の一考察〉，《法學研究：法律・政治・社



整體而言，戰後初期臺灣的日本出版品進口管制研究已有部分具體成果，但並未論述外交因素與談判過程。而關於臺日貿易談判內容，既有研究偏向外交關係的摸索，以及經濟面向的合作，對於出版品進口問題甚少提及。本文將利用中華民國外交部與相關政府檔案、日本外務省檔案以及參與人員的相關資料，重建談判過程，並探討雙方國內因素對談判的影響。言論管制不僅牽涉戒嚴時期的法規，帶有重塑「本省人」中國認同的對內政策目的，同時也處於冷戰時期的國際框架，透過內外交融的研究取徑才能更準確描繪施政的限度與底線，修正或補充既有的歷史圖像。

本文從政治與知識脈絡嘗試說明日本文化輸入臺灣的重要推動力，並不表示已窮盡所有因素。例如日本政府在文化事務上可能還扮演其他的角色，外務省情報文化局在1950年代中期整合政府部門及民間業者，展開「文化外交」的活動，意圖向海外輸出日本文化，然而受限於資料限制，日本「文化外交」政策與向臺灣出口出版品之間的關聯仍有待釐清。<sup>7</sup> 本文亦未及處理或許更為關鍵的經濟脈絡，日本民間出版業者在1953年組成「亞洲文化交流出版會」（後改名出版文化國際交流會），整合業界外銷與參加書展，其設定的首要市場即為亞洲，並注意到臺灣的市場價值。<sup>8</sup> 然而，該會在出版品談判時扮演何種角色，與政府單位（文部省國際文化課、外務省情報文化局、日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內委員會等）之間的合作情形仍不清楚。<sup>9</sup> 另外，該會的重要推手中島正一曾於「滿州書籍配給會社」工作，是否利用戰前的經驗與人脈，協助戰後日本出版品輸出至亞洲各地，是饒富趣味的議題，但也因資料稀少暫時無法處理。<sup>10</sup>

---

會》，第53卷第2期（1980年2月），頁1-28。

<sup>7</sup> 「懇談会記録」（1957年4月15日），〈文化外交に関する懇談会関係〉，《戰後外交記録》，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微卷編號：I'-0011。

<sup>8</sup> 依該會昭和30年度（1955年4月至1956年3月）的資料，扣掉尚未合併的琉球與眾多日本移民的巴西，臺灣在全世界的日本出版品出口數額占第四位，僅次於美國本土、韓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參見「昭和三十年度日本出版物輸出額統計表」，《矢部貞治關係文書》，檔號：6121/34/223/34/8/7。

<sup>9</sup> 〈出版文化国際交流委員会〉，《出版文化国際交流會會報》，第1期（東京，1956年1月），頁2。

<sup>10</sup> 是永保子，〈交流会と共に半世紀〉，收入出版文化國際交流會50年史編集委員會編，《出版文化国際交流會50年史》，頁19。



## 貳、管制政策與外交壓力

### 一、1950年代的管制措施

按筆者之前研究，日本出版品管制與雙方外交關係和國際處境密切相關，反映在主管單位和政策上即有相應的變化。從戰後到兩國斷交，整體的管制可區分為戰後初期（1945-1950）、臺灣省政府教育廳與新聞處主管時期（1950-1957）、教育部主管時期（1957-1962），以及內政部主管時期（1962-1972）。戰後初期致力清除日本文化，自然對進口也無正式的主管單位，但1950年則出現從省到中央、由文化交流到側重管制的主管部會變化。省教育廳與新聞處主管時期基本上確立了管制法規、體系與政策，嚴格限制進口，但在兩國簽訂和約後卻面臨日方不斷增加的壓力。教育部主管時期政策上的方向從「管制」轉為「交流」，日本出版品成為雙方親善友好的證明之一，進口措施上略有放寬，在內政部主管時期反映中華民國管制體系的簡化與整合。<sup>11</sup>

由四個時期可知，1957年政策由嚴轉為略寬，在當時的言論管制整體環境下可謂異數，而這正是雙方激烈談判攻防下的結果，亦即本文所欲處理的課題。以下簡述雙方大規模談判前的管制情形。

如前所述，戰後初期在「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政策下，並無太多積極性理由建立進口日本出版品的制度與管道，反而在內外情勢交迫下，一再採取緊縮政策。不論是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發布的「取締違禁圖書辦法」，或是一再重申禁賣、禁閱、封存等清除日本「遺毒」的行政命令，均顯示戰後中華民國對敵國文化的態度。<sup>12</sup> 1947年二二八事件，以及1949年5月臺灣進行戒嚴，都限縮了包

<sup>11</sup> 林果顯，〈「欲迎還拒」：戰後臺灣日臺出版品進口管制體系的建立（1945-1972）〉，《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45期，頁236-237。法規上當時的審查會議由臺灣省教育廳召集，但審查業務實際由省新聞處主導，因此將二者同列主管單位。

<sup>12</sup> 相關研究參見何義麟，〈戰後臺灣禁用日文政策之變遷〉，收入古川ちかし、林珍雪、川口隆行編著，《日本語在臺灣・韓國・沖繩做了什麼？》，頁46-55；菅野敦志，《台灣的言語と文字：「国語」「方言」「文字改革」》（東京：勁草書房，2012年），頁32-49；許雪姬，〈臺灣光復初期的語文問題〉，《思與言》，第29卷第4期（1991年12月），頁155-184。

含日本出版品在內的媒體空間，依戒嚴令所發布的「臺灣省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嚴密檢查各港口交通站旅客所攜行李以及起卸之印刷品，開啟了軍方介入言論管制的契機，自然也強化了對外來資訊的防堵。<sup>13</sup>

中央政府來臺後，防堵外來資訊的管制體系與措施陸續加強，也首次明確規範日本出版品的進口流程與標準。1950年6月，臺灣省政府公布「臺灣省日文書刊及日語電影片管制辦法」及「臺灣省日文書刊暨日語電影片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明訂審查委員會由教育廳、新聞處、秘書處、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及警務處遴派代表組織，負責購銷與查禁日文書刊之審查事宜。<sup>14</sup> 組織規程正面表列進口書籍標準為：1.純科學性者；2.純醫學性者；3.反馬列主義及反極權反暴力之思想理論著作；4.其他與我國社會及文化確有裨益者。<sup>15</sup> 根據此規定，首批核定准予進口的書單只有五十餘種（包含雜誌），大多偏向自然科學等實用性類別，限制社會科學著作。<sup>16</sup>

相關法規的出現，一方面顯示政府加強管制力道，另一方面也反證日本出版品流入臺灣的數量已到不可不管的地步。1951年3月，臺灣省新聞處召開「處理中外書刊檢討會」，全面檢討管制體系及法規的紊亂，主管出版的中央機關內政部也對日本出版品「源源不絕」輸入臺灣噴有煩言，迫使管制體系必須檢討。<sup>17</sup> 歷經兩次修改後，1951年8月「臺灣省日文書刊管理辦法」採用總量管制的方式，以外匯數額限制進口數量（規定每月進口數量，以1950年8月至1951年5月間十個月所耗外匯平均額為準），並增訂更嚴格的進口標準如下（表1）。

<sup>13</sup> 「臺灣省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1949年5月28日），《臺灣省政府公報》，民國38年夏字第67期（1949年6月），頁834-835。

<sup>14</sup> 「臺灣省日文書刊及日語電影片管制辦法」（1950年4月21日），《臺灣省政府公報》，民國39年夏字第62期（1950年6月），頁923。

<sup>15</sup> 「臺灣省日文書刊暨日語電影片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1950年4月21日），《臺灣省政府公報》，民國39年夏字第62期，頁923。

<sup>16</sup> 何義麟，〈戰後臺灣禁用日文政策之變遷〉，收入古川ちかし、林珍雪、川口隆行編著，《日本語在臺灣・韓國・沖繩做了什麼？》，頁64。

<sup>17</sup> 「抄送處理中外書刊研討會議紀錄、英文書刊進口一律改為事後審查」（1951年3月28日），〈新聞雜誌管制〉，《省級機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41372016057009；「准內政部電以日文報刊之入口銷售應嚴加審查與取締等由轉電知照由」（1950年12月13日），〈日文書刊電影管制辦法〉，《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0040750011900003。

表1、日文書刊進口標準一覽表（1951年8月）

准予進口標準	禁止進口標準
1.自然科學或應用科學	1.損害中華民國利益或民族尊嚴者
2.教育文化機關團體自用參考用書	2.不適合中華民國教育宗旨者
3.學術性研究或確為文學名著	3.公共秩序者
4.反共抗俄之理論著作	4.妨害善良風俗者
5.關於醫藥衛生烹飪縫紉等書刊	5.提倡迷信邪說者

資料來源：「臺灣省日文書刊管理辦法」（1951年8月23日），《臺灣省政府公報》，民國40年秋字第47期（1951年8月），頁572。

至此進口管制體系大致底定。此時期以省新聞處主導審查業務，海關與軍警負責邊境檢查與市面取締，決策上則可見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黨部與高層的意志。<sup>18</sup>

## 二、中日和約簽訂前後的折衝

在前述的管制政策下，日方並非默不做聲。日方首先訴求為放寬非營業性的小額書刊，亦即以郵遞方式小規模寄送至臺灣的技術性問題。1950年9月，臺日締結貿易協定，原應推進雙方商品往來，但隔月日方就接到臺灣方面的通知，日本寄送印刷品至臺「規定須先經臺灣省政府核准後，始得收寄」。但一來核准書單並未公布，一般日本人也無力在臺尋求代辦申請審查，此規定使日本不敢投寄

<sup>18</sup> 在臺灣省政府公文中，發現一既定流程「由教育廳等五機關組織之審查會及新聞處主持之省級各機關書刊審查小組分別審查，並經書刊進口小組加以覆核」，書刊審查小組似被稱為「初核小組」，臨時省議會省議員陳逢源亦陳述日文書刊進口審查有初審與再審兩組。此一流程因史料限制詳情尚未得知，有待進一步探查。參見「陳逢源提案改正日文書籍檢查辦法案省政府函復請指定議員參加日文書刊初核小組審議」（1952年9月15日），〈臺灣省臨時省議會檔案〉，《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識別號：002\_61-600-41006。

出版品至臺灣。<sup>19</sup> 此事在省政府、省新聞處、內政部與國民黨宣傳業務小組之間反覆公文呈轉後，最後省政府以國語運動下難以大量開放進口為由，表示進口政策的改變須等雙方和約簽訂後再談。<sup>20</sup>

以拖待變的結果，當1952年8月「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簽訂生效後，來自外交的壓力陡然升高。該和約第六條乙項規定，「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願依聯合國憲章之原則彼此合作，並特願經由經濟方面之友好合作，促進兩國之共同福利」。<sup>21</sup> 而和約議定書第二條也明訂「貨物之進口及出口或與其有關之規章，給予最惠國待遇」。<sup>22</sup> 日本據此除了對於著作權、專利權、商標專用權等有形和無形財產權，要求互相享有最惠國待遇之外，也對日本出版品輸臺長期以來的諸多限制，有了更強烈要求修正的動機與根據。<sup>23</sup>

1953年8月，日本駐中華民國大使芳澤謙吉至外交部辦公室，與中華民國外交部長葉公超直接進行會談。芳澤謙吉以報紙訂閱受限為例，抗議日本書刊無法進口臺灣，葉公超則以未結匯而受海關阻撓的個案，否認進口限制政策，雙方並未達成共識。<sup>24</sup> 該次會談後日方並未放棄，反而製作備忘錄，重述芳澤謙吉的談話大意，正式要求出版品全面開放進口。<sup>25</sup> 外交部亦製作備忘錄回覆日方，列出過去一年進口日本圖書的數額，並稱只要內容不違背反共抗俄國策及「出版法」

<sup>19</sup> 「關於日文書刊寄臺辦法可否稍予放寬以利中日文化之交流」（1951年3月31日），〈日文書刊進口〉，《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303-0033。

<sup>20</sup> 「准電囑修正日文書刊管制辦法復請查照由」（1952年3月28日），〈日文書刊進口〉，《外交部》，典藏號：020-090303-0033。

<sup>21</sup> 〈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1952年4月28日簽訂），收入「全國法規資料庫」：<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Y0010076>（2021/8/31點閱）。

<sup>22</sup> 〈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之議定書〉（1952年4月28日簽訂），收入「全國法規資料庫」：<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Y0010079>（2021/8/31點閱）。

<sup>23</sup> 「日本出版協會發外務大臣宛台灣における日本出版物の版權侵害被害に関する請願書」（1952年12月13日）；「中華民國外交部致日本大使館外交節略」（1953年3月18日），〈本邦諸外国間著作權關係雜件第一卷〉，《戰後外交記錄》，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檔號：I'-0079。

<sup>24</sup> 「外交部葉部長與日本駐華芳澤大使談話紀錄」（1953年8月27日），〈日文書刊進口〉，《外交部》，典藏號：020-090303-0033。

<sup>25</sup> 「外第125號備忘錄」（1953年8月27日），〈日文書刊進口〉，《外交部》，典藏號：020-090303-0033。

第三十三條者，事前申請均核准輸入，藉以反駁「全面禁止進口」的說法。但對於日本報紙，則以「不無趨向左傾之消息與言論」，並將中華民國政府與「匪共偽政權」予以等同看待等理由，明確拒絕。<sup>26</sup> 談判仍舊停滯未前。

雙方之所以在此問題上觸礁，實因中華民國政府的政策並未因和約而改變。國民黨中常會在和約即將生效的前夕，為因應新情勢而提出「中日文化合作政策」，明白指出雙方合作以「反共抗俄」為前提，深深警戒允許共產黨公開活動的日本社會狀態，故必須對文化商品設下部分限制。<sup>27</sup> 隨後的各項小幅度調整，並未因和約而有太大變化。從日方的角度來看，名曰合作，實則仍為阻礙。

二戰結束以來臺灣對日本進口出版品並不友善，特別是中央政府來臺後，為了防堵危險資訊，各種外來出版品被嚴格管制，這當然並非單獨針對日本出版品。只是日本出版品並非單純的外國出版品，日語是臺灣的「前國語」，也是多數的被統治者在知識與娛樂層面的強勢語言，這都挑戰了當時政府欲藉由國語齊一心志、致力讓臺灣人重溫祖國文化的基本政策，以致對日本出版品採取嚴格的進口管制。然而，日本對此事無法視而不見，特別是當日本逐漸走出戰敗陰霾，文化產業重新站起，國內市場日益競爭，尋求海外市場成為迫切之舉，擁有廣大日語人口的臺灣成為重要之地。在雙方需求有所衝突下，有待更高層次的折衝談判。

### 叁、交流增溫與談判人員背景

出版品進口看似技術性問題，但隨著雙方外交關係轉變，逐漸成為證明彼此關係升溫的試金石之一。如上所述，1950年之後臺日確立貿易方式，但在外交問題上有諸多待解的問題，對於和約之後的「盟友」關係仍在摸索階段。1950年代

<sup>26</sup> 「備忘錄」（1953年9月30日），〈日文書刊進口〉，《外交部》，典藏號：020-090303-0033。

<sup>27</sup> 「中央改造委員會第373次會議紀錄」（1952年7月25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決議案彙編》（臺北：中央委員會秘書處，1952年），頁379。



中期雙方開始試圖增溫，派出大規模的代表團互訪，使得出版品議題得以從外交公文的冗長往返，出現在短兵相接的當面討論場合，甚至最後直達層峰，讓政策出現改變的契機。

## 一、張道藩訪問團的試溫

1950年代中期，臺日雙方對國際情勢的判斷，促成了訪問團的互訪，也逐步建立外交體系之外的溝通管道。1955年8月，以日本眾議員大野伴睦為首，組成跨黨派的國會議員訪問團來臺，隔年4月時任立法院長的張道藩率團訪日，這是雙方戰後建交以來第一次的大規模互訪。從張道藩訪問團成員來看，臺灣方面對此行頗為重視，政界包括教育部長張其昀、立法委員倪文亞和胡健中、臺灣省教育廳長陳雪屏、省議會議長黃朝琴，財經界重要人士則有羅萬俔、束雲章與林柏壽。<sup>28</sup> 這個代表團雖亦有經濟性質，但主要目的是政治性的，臺灣方面希望能淡化日本政界往共產勢力靠攏的趨勢。事實上，日本自從脫離美國占領後，一直試圖尋求與蘇聯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往來，自1955年1月起，日本與蘇聯開始交涉建交事宜，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對日展開「和平攻勢」，這無疑對中華民國政府構想中的亞洲反共陣線是一大警訊。<sup>29</sup> 這段時間日本政界人士對臺灣地位近乎「兩個中國」的發言，以及1955年因中華民國反對蒙古加入聯合國，導致蘇聯否決日本加入聯合國一案等事，都讓兩國外交關係緊張。<sup>30</sup> 因此張道藩率領訪問團到日本，既表達中華民國方面重視對日關係，也希望藉此緩減日本政界和民間積極與共產集團往來的熱潮，鼓吹並強化日本的反共力量。<sup>31</sup> 整體而言，臺灣方面希望推動反共自由陣營，日本方面則希望雙方交流有助於加入聯合國一事，雙方都跨出了之前民間層次的商貿往來，帶有政治目的。但在具體作法上，相較中華民國

<sup>28</sup> 「中華民國各界代表日本親善訪問團略歷」，〈日本各界中華民國親善團關係石井光次郎團長（一九五六・八）〉，《戰後外交記錄》，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檔號：A'-0389。

<sup>29</sup> 井上正也，《日中国交正常化の政治史》（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0年），頁108-111。

<sup>30</sup> 川島真等著，高村繁、黃偉修譯，《台日關係史 1945-2020》（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21年），頁66-69。

<sup>31</sup> 「立法院長等訪日親善使節團に関する件」（1956年4月10日），〈日本各界中華民國親善團關係石井光次郎團長（一九五六・八）〉，《戰後外交記錄》，檔號：A'-0389。

方面直接提出反共訴求，日方則是儘量減少政治議題，強調經濟與文化合作。

也就是在雙方都有意營造關係加溫的前提下，像出版品進口這種長期懸案得到進一步磋商的機會。張道藩訪日時出版品問題尚未被提出，但有一事與後來的發展密切相關，即其訪問使得日本政界的保守派政黨之中出現親中華民國的團體，自由民主黨的部分人士成為對臺交流的主導者，而此管道與人際關係成為日後出版品談判的基礎。<sup>32</sup> 在上述人士的奔走之下，籌組經濟文化界訪問團回應張道藩訪問團，而其所設定的文化議題，最優先的項目即是出版品進口。<sup>33</sup>

## 二、雙方談判重要成員簡介

1956年8月20日，由日本國會議員暨自由民主黨（以下簡稱自民黨）總務會長石井光次郎率領的「日本各界中華民國親善訪問團」（以下簡稱「石井訪問團」）抵臺，並依雙方需求，舉行了政治、經濟與文化小組會議。前已述及，日方重點在經濟與文化，但亦非沒有政治考量，臺灣方面則重視政治意義，但對經濟合作也抱有期待。比較有趣的是文化議題，這個看似無傷大雅但卻具高度交流象徵意義的領域，其實是雙方1950年以來難以解決的懸案，當日方把文化議題定位為來訪的重要任務之一，勢必碰觸到打開進口限制的敏感問題。對臺灣而言，談判的官員沒有外交單位作為緩衝，必須面對日方的直接質疑，在攻防中已無退路，盡顯政策底線。日方訪問團別出心裁，直接與臺灣方面層峰建言，打破了一直以來的政策原則，在出版品管制的歷史中可謂戲劇性的一刻。

即便是帶有如此重要的外交性質，討論的也是關係兩國重要利益，但在談判的身分位階上頗不相類。日本方面將此團定位為民間性質，全無政府官員，國會議員僅兩位，成員則包含大學校長、學者、記者與媒體經營者。反之，臺灣由教育部長擔任主席，與日本出版品進口業務相關之政府官員多參與其中。這些日方人士的個別經歷顯示了他們與臺灣的淵源或興趣，但他們的集體特色則可反映是什樣的立場讓他們來到臺灣。相對地，臺灣方面的官員背景則反映了官方政策，較少個人的影響力。

<sup>32</sup> 川島真等著，高村繁、黃偉修譯，《台日關係史 1945-2020》，頁68。

<sup>33</sup> 「張道藩一行の帰国後本邦における関係者の動静」（1956年6月8日），〈日本各界中華民國親善團關係石井光次郎團長（一九五六・八）〉，《戰後外交記錄》，檔號：A'-0389。



### （一）日方成員簡介

石井光次郎訪問團組成涵蓋政治、經濟與文化三方面人士，與出版品談判最相關者，主要是團長石井光次郎，負責輿論宣傳的副團長御手洗辰雄，以及雖隸屬政治小組，卻在出版品議題中具關鍵影響力的拓殖大學校長矢部貞治。另外，此訪問團主要的籌劃者、同時也列名總幹事，則是與政界關係密切的民間智庫主持人矢次一夫，上述四位為出版品談判的主要人士。團長石井光次郎是當時日本政壇中具有臺灣經驗的重量級人士。石井光次郎為日本福岡縣人，東京高等商業學校畢業，通過高等文官考試後，歷任警視廳警部、臺灣總督府秘書課長兼外事課長，1922年進入朝日新聞社。1947年擔任商工大臣，後遭駐日盟軍剝奪公職，復歸後於1953年擔任吉田茂內閣的運輸大臣，1956年競選自民黨總裁失利，1957年擔任岸信介內閣的副總理，之後歷任大臣，1967年擔任眾議院議長，被視為親臺派的重要成員。<sup>34</sup> 石井光次郎擔任回應張道藩訪問團的團長，既有上述臺灣經歷，同時臺灣方面對他的期待頗深。按駐日大使館的說法「其人穩重篤實，反共親華，為緒方竹虎死後舊自由黨系之中堅，鳩山一郎退休後繼任閣揆之呼聲甚高，為最有希望之保守系政治家」。<sup>35</sup> 石井光次郎以其臺灣經驗與反共立場，身為新任總理的熱門候選人之一，是當時搭建兩國進一步交流關係的適合人選。

相對於石井光次郎的政治性質，副團長御手洗辰雄作為記者與評論家，臺灣方面則期待他能協助宣傳臺灣與反共。御手洗辰雄為日本九州大分縣人，慶應大學肄業，長期從事媒體業，戰前擔任過《報知新聞》社會部長、《京城日報》社長、《東京新聞》論說委員長，戰後則成為政治論者家，對保守派政黨有一定影響力，駐日大使館評價他為「目前日本最有權威政論家之一」。<sup>36</sup> 矢部貞治生於

<sup>34</sup> 石井光次郎，《回想八十八年》（東京：カルチャー出版社，1976年）；〈石井光次郎關係文書〉，收入「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https://rnavi.ndl.go.jp/kensei/entry/ishiimitsujirou.php>（2019/8/31日點閱）。

<sup>35</sup> 「為呈報日本國各界中華民國親善訪問團名單及履歷由」（1956年7月31日），〈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訪華（一）〉，《外交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045/012/22。

<sup>36</sup> 〈御手洗辰雄〉，收入「ブリタニカ国際大百科事典 小項目事典」：<https://kotobank.jp/dictionary/britannica/2083/>（2021/8/22點閱）；「為呈報日本國各界中華民國親善訪問團名單及履歷由」（1956年7月31日），〈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訪華（一）〉，《外交部》，檔號：045/012/22。

鳥取，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畢業，留學英、美、法、德諸國，政治學博士，曾任東京帝大、早稻田大學等校教授與講師，1955年任拓殖大學校長，為政治學權威。<sup>37</sup> 以上兩位在駐日大使館提供的團員履歷中並未詳介，但他們在出版品談判時，基於媒體和學界的實況，對於反共政策的進口管制提出強烈批評，成為談判中主要的攻擊手。

訪問團的總幹事矢次一夫負責訪問團與策進會的成員邀請、會議構成，以及與日本外務省和臺灣方面的聯繫，成員中也多人身兼其所推動的智庫國策研究會幹部，可視為矢次一夫人脈的展現。矢次一夫在日本佐賀出生，1925年於東京創立勞動事情調查所，調停大型勞動爭議。1933年與統制派幕僚陸軍少佐池田純久集結官僚、學者、社會運動者與政治家等創立國策研究同志會，協助政府擬定政策。戰後被駐日盟軍剝奪公職，解除後再建國策研究會，1957年推動籌組中日合作策進會，1958年擔任首相岸信介特使訪問韓國總統李承晚，厚植日本與中華民國及韓國之間的交流基礎。<sup>38</sup> 矢次一夫並無顯赫的家世與學歷，但在戰前激烈的勞工運動中廣結左右派人脈，並從戰前至戰後與政界和產業界領袖保持密切關係，甚至影響組閣倒閣。<sup>39</sup> 駐日大使館評價為「此人徹底反共，對保守陣營及社會黨多數領袖，具有極大影響力，其主持之國策研究委員會，為目前日本最具實力之政治團體」。<sup>40</sup>

而負責出版品談判的文化小組，其成員以媒體主管和評論家為主，這與雙方希望擴大媒體產業合作與輿論力量有關。澁澤敬三、清田良知和春日由三負責廣播節目交換、技術合作與電視台籌備等議題；宮田重雄的畫家身分則針對雙方的美術交流問題發言；鍋山貞親為前共產黨轉向者，因為熟悉共產主義的理論，是對抗左派言論的大家。除此之外，影響出版品進口事項的成員不限於文化小組，政治小組的評論家細川隆元與上述拓殖大學校長矢部貞治等人均積極與會（詳見表2）。

<sup>37</sup> 「為呈報日本國各界中華民國親善訪問團名單及履歷由」（1956年7月31日），〈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訪華（一）〉，《外交部》，檔號：045/012/22。

<sup>38</sup> 林雅行，〈監獄部屋から目覚めた「怪物」矢次一夫〉，《政界》，第20卷第4期（東京，1998年4月），頁49。

<sup>39</sup> 大宅壯一，〈矢次一夫論〉，《大宅壯一選集》，第19人物群像（東京：筑摩書房，1959年），頁112-131。

<sup>40</sup> 「團員履歷」，〈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訪華（一）〉，《外交部》，檔號：045/012/22。

表2、日本各界中華民國親善訪問團雙方主要成員名單

日本方面	姓 名	身 分
主要幹部	石井光次郎（團長）	自民黨總務會長（政）*
	堀越禎三（副團長）	經團連事務局長（經）
	御手洗辰雄（副團長）	評論家（文）*
	矢次一夫（事務局長）	國策研究會常任理事（政）*
政治小組	矢部貞治	拓殖大學校長
	細川隆元	評論家*
文化小組	澁澤敬三	國際電信電話社長*
	清田良知	國際電信電話通信部次長
	春日由三	NHK廣播局長
	鍋山貞親	評論家*
	宮田重雄	醫學博士、畫家
	石井公一郎	團長秘書
	加藤昇	日華文化政經聯誼會幹事長
臺灣方面	姓 名	身 分
	谷正綱（主任委員）	亞洲人民反共聯盟中國總會理事長
	黃朝琴（副主任委員）	臺灣省臨時省議會議長、中日文化經濟協會副會長
	陳雪屏（文化座談會主席）	前臺灣省教育廳廳長
	張其昀（文化談話會主席）	教育部長

資料說明：打星號者為國策研究會幹部，矢次一夫與澁澤敬三為常任理事，政治小組的松岡駒吉為諮詢委員（相談役），其餘為理事。

資料來源：「為呈報日本各界中華民國親善訪問團名單及履歷由」（1956年7月31日），〈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訪華（一）〉，《外交部》，檔號：045/012/22。

即便石井光次郎的身分具政治意味，但日方將此次任務定位為民間交流，從上述成員身分可清楚看出。這也使得日方在談判時可以有更大的空間，從自身的領域與經驗，對臺灣的政策提出批評與要求，不受限於官方其他政策考量或外交辭令的周旋。相對地，臺灣的接待人員則以官員為主體，這也使得在談判上先天處於不對等狀態。

## （二）臺灣方面成員簡介

由於日方為非官方性質，因此臺灣方面由亞洲人民反共聯盟中國總會（以下簡稱「亞盟中國總會」）及中日文化經濟協會出面邀請。由亞盟中國總會理事長谷正綱擔任接待委員會主任委員，副主委為臺灣臨時省議會議長及中日文化經濟協會副會長黃朝琴，兩人統籌招待事宜。但在談判上則因應議題，邀請不同的官員及專家與會。談判分成公開的座談會及不公開的小組談話會，谷正綱、黃朝琴與陳雪屏分別主持反共、經濟與文化座談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小組談話會，則由谷正綱、徐柏園及王撫洲，以及張其昀主持。<sup>41</sup> 其中與出版品問題最相關者為陳雪屏與張其昀。

陳雪屏，江蘇宜興人，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遊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心理研究所，返國後講學東北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大等。中日戰爭時期任三民主義青年團青年部部長，戰後短暫代理教育部長，來臺後歷任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廳長、考選部部長、行政院秘書長。<sup>42</sup> 石井訪問團來訪前後，陳正好暫無公職，因此在官方的介紹是以臺大教授以及正中書局董事長為頭銜，但實則因其卸任省教育廳廳長不久，嫻熟日本出版品進口規定，在談判中成為傳達與捍衛政府立場的最有力者之一。<sup>43</sup>

<sup>41</sup> 「接待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報告」（1956年9月），〈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訪華（一）〉，《外交部》，檔號：045/012/22。

<sup>42</sup> 陳棠，〈陳雪屏先生事略〉，《國史館館刊復刊》，第27期（1999年12月），頁213-214。

<sup>43</sup> 〈陳雪屏〉，收入「中華民國政府官職資料庫」：<http://gpost.lib.nccu.edu.tw/display.php?&q=name:陳雪屏>（2021/8/23點閱）；「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委員名冊」（1957年3月19日），〈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案（第一冊）〉，《外交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031.3/0034。

另一位重要的談判主導者為張其昀，浙江鄞縣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史地系畢業，任職中央大學、浙江大學等地理系或史地系教授，為著名地理學者。任職浙大時期開始擔任國民參政員，後成為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與常務幹事，並為制憲國民大會代表、第一屆國民大會主席團主席。1949年開始歷任黨政要職，包括國民黨總裁辦公室秘書組主任、宣傳部部長、中央評議委員會主席、教育部部長等，之後創辦中國文化大學。<sup>44</sup> 1954-1958年張任職教育部長，正是石井訪問團來臺之時，在談判期間和之後政策落實上扮演重要角色，和陳雪屏可謂同一體系的政府代表。

本文不欲一一詳細介紹其餘臺灣方面成員，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出線是源於所擔任官職的責任，其本人對出版品進口政策或臺日文化交流的個人理念，很難在談判時展現。這些人包含新聞局副局長朱新民、臺灣省政府秘書長謝東閔、臺灣省政府新聞處吳錫澤與前教育部長杭立武，而時任立法院長的張道藩，以及《中央日報》董事長與中日文化經濟協會常務理事的陶希聖，也是黨政要員。上述成員以主管教育文化政策的中央與臺灣省政府層級官員為主，都是實務負責人，在接下來的談判過程中，可以看到他們努力貫徹高層意志與守護國策。而其他與會人員多為學者與新聞界人士，相對於官員並沒有在談判中發揮太多作用。

上述臺日人員重要談判人員，大致延續至1957年之後的中日合作策進會文化小組，在身分上仍維持臺方為業務相關官員（前省教育廳長陳雪屏、教育部次長吳俊升、駐日公使張伯謹），日方則以矢部貞治為首，多邀學界人士參與（參見表3）。此結構上的差異，既因臺日雙方對交流一事的期待有所落差，同時也使得臺灣在談判上備受壓力。<sup>45</sup> 而雙方如何攻防，須細究會議過程方可得知。

<sup>44</sup> 高明，〈鄞縣張曉峯先生其昀行狀〉，收入中國文化大學張其昀先生紀念文集編纂委員會編，《張其昀先生紀念文集》（臺北：華岡印刷廠，1986年），頁1-6。

<sup>45</sup> 這是整個策進會雙方成員結構造成的影響，當時的記者司馬桑敦即認為這使得中華民國在談判上大為吃虧。司馬桑敦，〈中日合作策進了些什麼？〉，收入司馬桑敦，《中日關係二十五年》（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8年），頁55-56。



表3、中日合作策進會文化小組前三屆委員名單

	臺方成員	日方成員
第一屆（東京） 1957年4月	陳雪屏（臺大教授、正中書局董事長） 吳俊升（教育部次長、中國教育學會理事長） 張伯謹（駐日公使）	矢部貞治（拓殖大學校長） 赤松要（一橋大學教授）* 高山岩男（日本大學教授）*
第二屆（臺北） 1957年10月	陳雪屏 吳俊升 汪公紀（中日文化經濟協會常務理事） 方豪、王星舟、朱新民、李樸生、陳固亭、張興周、游彌堅、劉真與謝東閔	矢部貞治 高山岩男* 井口貞夫（前日本駐美大使） 北村隆（前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所長） 增聘：小泉信三、小野秀雄
第三屆（東京） 1958年6月	陳雪屏、吳俊升、汪公紀	矢部貞治（召集人）

資料說明：打星號者為國策研究會理事，矢部則與國策研究會淵源甚深。

資料來源：〈日華協力委員會懇談會記錄〉（1957年9月），《矢部貞治關係文書》，（日本）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圖書館藏，檔號：876/6/42；「與會人員」，〈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案（第二冊）〉、〈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案（第三冊）〉，《外交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031.3/0035、031.3/0036。

## 肆、談判與轉折

1950年代中期一連串有關出版品的談判，其造成的政策轉折，以及促成了中日合作策進會此種新的交流管道，或許是雙方皆始料未及。日方目標明確，在於敲開管制的大門；臺灣方面則力圖捍衛既有規定，原本可能陷於僵局的談判，卻在層峰的首肯之下，出現了鬆動的可能。此一系列談判過程，既往學界較少觸及，以下藉由較詳細的描述，釋明此事在日本出版品進口政策中的意義以及其限制。

## 一、石井訪問團的突破

1956年8月20日，策進會文化小組舉行第一次談話會，一開始日方就鎖定言論自由與出版品進口問題，有備而來。評論家細川隆元第一個發言即對臺灣媒體環境發難，直言臺灣的報紙和戰時日本一樣，無法看出世界大勢，且醫學與法學雜誌無法進口，難以談到真正的「中日合作」。細川隆元並提到，他曾向臺大校長建議，應設置機構先行審查，剔除容共的書刊。主席張其昀指定朱新民和陳雪屏回應，朱新民以報紙內容受限於篇幅限制自然難以豐富來辯護（報禁中的限張政策），陳雪屏則以曾參加省府審查工作的經驗，說明雜誌審查一是為了「思想」，二是節省外匯，並透露正研擬改進審查作業。<sup>46</sup>

陳雪屏所說的是1951年8月修正的「臺灣省日文書刊管理辦法」，該辦法明訂禁止進口原則：損害中華民國利益或民族尊嚴者、不適合中華民國教育宗旨者、破壞公共秩序者、妨害善良風俗者、提倡迷信邪說者。同時，進口數額以1950年8月至1951年5月這十個月所耗外匯平均數為準。<sup>47</sup> 問題是這個法規制訂於1951年，為「中日和約」簽訂前的制度，日方目的就是要突破既有限制，臺方均以現況回答，當日談話雙方並無交集。

出版品進口本來只是日方想突破的問題之一，但隨著情勢發展，重要性陡然提高。訪問團其他成員在與各方接觸時，感受到臺灣方面強力運作亞洲人民反共聯盟的企圖，逼迫訪問團對政治議題表態。20日當晚在參加完副總統陳誠主持的晚宴後，日方代表回下榻處召開緊急集會，研商對策，會中決定婉拒反共聯盟，並為了沖淡政治意味，決定集中力量在文化和經濟合作。<sup>48</sup> 這也使得隔天日方更加集中火力於出版品議題。

8月21日，舉行文化小組第二次談話會，進行實質攻防。矢部貞治率先發言，認為日本出版品的審查機構除了篩選書刊外，亦可加以排除「親共容共」的

<sup>46</sup> 「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文化小組第一次談話會速紀錄」（1956年8月20日），〈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訪華（三）〉，《外交部》，檔號：045/012/22。

<sup>47</sup> 「臺灣省日文書刊管理辦法」（1951年8月23日），《臺灣省政府公報》，民國40年秋字第47期（1951年8月），頁570、572。

<sup>48</sup> 矢部貞治，《矢部貞治日記 紅葉の巻》（東京：讀賣新聞社，1975年），頁208。



學者及留學生，以促進雙方的學術交流。有意思的是，由於矢部貞治的用詞是「書刊交換」，因此主席張其昀答以中央圖書館與世界150個大學交換圖書，並將問題導向增加書刊交換單位，並未正面回應審查機構的內涵。隨行採訪的《朝日新聞》政治部記者橋本文雄指出日本報紙被限制進口的情形，唯一准許的《內外時報》在日本閱讀人口很少，希望其他報紙亦能進口。細川隆元則提議，或許可預從朝日、每日、讀賣與產經四大報選定一種並限制份數，提供給臺灣政府高層人士閱讀，「因為日本是言論最自由的國家」，可以確知日本的情形。新聞處長吳錫澤回應說明，並非僅針對日本報紙，而是對所有外來報紙都嚴格限制，因為須有「堅定的反共立場」，故不得不限制。

雖然雙方行禮如儀，但日方以「文化交流」和「言論自由」為主張，不斷質疑出版品的各種限制，臺灣官員難以再閃躲，彷彿備詢般努力堅守底線。更重要的是，由雙方共同成立審查機構已成為日方固定的要求，僵持之下，日方成員只能透過更高層次的影響力，希望能有所突破。

第二次談話會結束後，副團長御手洗辰雄與矢部貞治等人赴陽明山與蔣介石會見，當面提出擴大文化交流的議題。<sup>49</sup> 矢部貞治直陳臺灣會認為日本在立場上「中立」或「容共」，就是因為不夠瞭解日本，而「散布臺灣各處之日文書刊（包括電影）多係低級趣味之作品，充斥街頭，而真正有學術價值者反毫無所見」，因此直接向蔣提出雙方共組審查機構的想法。蔣介石則表示，藉來訪機會已對總統府秘書長張羣說明，「可對過去之辦法多加檢討，以謀改進」。<sup>50</sup> 日方將此視為承諾，而此事若成真，無疑是1950年日本出版品進口政策確立以來的最大變動。

日方自然緊抓住機會，設法促成此事。會面隔天的公開座談會上，細川隆元開場致詞時即透露此事，並說總統指示應該在出版品交換上有具體作為，而御手

<sup>49</sup> 1956年8月21日下午，御手洗辰雄、鍋山貞親、高橋龜吉、矢部貞治及矢次一夫拜訪蔣介石。矢次一夫，〈自由中国親善訪問に関する報告（一）〉，《新國策》，第4卷第26期（東京，1956年10月5日），頁3。

<sup>50</sup> 「總統召見日本訪問團副團長御手洗辰雄暨團員高橋龜吉等五人談話紀錄」（1956年8月21日），〈對日本外交（四）〉，《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6-00067-004。

洗辰雄返日後將此事過程詳細披露於報端。<sup>51</sup> 這一切的作法，皆可看到日方積極公開此事，冀望逼迫臺方解除出版品輸臺障礙。<sup>52</sup> 然截至整個代表團離開為止，臺灣的官方代表並未進一步回應，也未討論具體執行方案，結果仍有待新一回合的磋商。

## 二、從聯席會到策進會

非常態性質的訪問團可以達成雙方親善的效果，但若欲實質合作仍需後續的落實配合。外交部在訪問團回日本後，整理了訪臺期間所提各項問題辦理情形，在東京設立聯席委員會一事被列入清單內，並諭令駐日大使沈觀鼎與該團負責人聯繫。<sup>53</sup> 另一方面，在雙方的積極運作下，原規劃的聯席委員會從出版品處理單位一躍成為雙方常態且全面性的意見交換組織，可以說1950年代中期之後臺日關係的深化，是藉由出版品進口議題發展而來。

相較於臺灣方面的消極，訪問團回日本後立刻積極運作，希望達成訪臺期間的協議內容。訪問團總幹事矢次一夫於1956年9月底致函張羣，希望在原本較為紛雜的協議事項中，選擇較簡單並富有政治性的項目予以優先實行，所提的即是蔣介石亦承諾的出版品聯席委員會。矢次一夫與駐日大使館商談後，提議聯席會成員10人，雙方代表各半，日方成員由之前訪問團中選任5人，臺方則由旅日中國人士出任，由張羣或大使館選任。矢次一夫在信中並謂日方推派代表為御手洗辰雄、矢部貞治、鍋山貞親、崛越禎三與矢次一夫擔任；文末並強調此舉將給予「中共」重大打擊，希望張羣能予以促成。<sup>54</sup> 這份名單包括了石井光次郎訪問團

<sup>51</sup> 御手洗辰雄，〈農民が日本人の銅像 蔣總統もよき理解者〉，《讀賣新聞夕刊》，東京，1956年9月18日，版1。御手洗辰雄回日後以連續七天連載形式，將訪臺見聞投稿於《讀賣新聞夕刊》，之後濃縮翻譯成中文，刊載於《中央日報》（1956年9月26日版2、27日版2），可見得黨政方面亦知總統所做的承諾。

<sup>52</sup> 「接待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文化小組座談會速紀錄」（1956年8月22日），〈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訪華（三）〉，《外交部》，檔號：045/012/22。

<sup>53</sup> 「外交部呈行政院稿」（1956年11月2日），〈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案（第一冊）〉，《外交部》，檔號：031.3/0034。

<sup>54</sup> 「矢次一夫致張羣函」（1956年9月29日），〈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案（第一冊）〉，《外交部》，檔號：031.3/0034。

的兩個副團長與總幹事，並涵蓋了學界與反共理論家，可謂重視。事實上，石井光次郎返日後拜訪駐日大使館重提蔣介石的承諾，而前述御手洗辰雄在《讀賣新聞夕刊》揭露蔣介石應允一事，可知日方動作不斷，使得駐日大使館備受壓力。<sup>55</sup>

正當公文在總統府秘書長、外交部與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日文書刊主管單位之一）之間層層轉達之際，日方又有新的提議。矢次一夫再致函張羣，將聯席會提升為「日華親善協力委員會」，性質是涵蓋政治、經濟與文化方面的民間諮詢機構，除了雙方成員各擴增為10人，各推3人為常務委員，希望谷正綱與黃朝琴亦能加入，並提出具體時程，希望在該年12月中旬召開成立大會。<sup>56</sup> 時序至12月初，日方再表示希望臺灣由中日文化經濟協會與亞洲人民反共聯盟中國總會出面，召集臺灣民間有力人士參與，同時也對時程延宕表達失望。<sup>57</sup> 另一方面，11月底駐日大使館也主張接受此擴大的民間委員會，建議外交部在此委員會下設立小組，專門處理日文書刊進口審查，並優先辦理此項以符合日方期待。<sup>58</sup>

事實上，蔣介石的想法與官僚間有一定的落差，但在他的意志下，確實改變了管制政策。蔣介石在日方回國後不久，召開宣傳會談，指示「檢查機構可取消，應速照辦」，確立了管制鬆動的方向。<sup>59</sup> 1956年10月，此案上升至國民黨中常會，決議將日文書刊的審查單位由臺灣省教育廳移至教育部，並打算在東京的駐日大使館增設「中日聯合審查會」負責初審，可見黨政高層基本上接受了日方

<sup>55</sup> 「沈觀鼎致葉公超函」（1956年9月24日），〈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案（第一冊）〉，《外交部》，檔號：031.3/0034。

<sup>56</sup> 「矢次一夫致張羣函」（1956年11月24日），〈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案（第一冊）〉，《外交部》，檔號：031.3/0034。按徐年生研究，中華民國政府、特別是蔣介石並不希望聯席委員會僅限於文化事務，而希望擴及政治、經濟範圍，與本文史料說法相衝突。由於所引資料為1957年1月29日矢次一夫致井口貞夫的信件內容，在時序上明顯晚於矢次致張羣函件（1956年11月24日），且就兩國前後史料顯示，在此事上向以日方較為積極，因此暫不採矢次1月29日的說法。然矢次何以如此敘述，箇中緣由或值得進一步探索。參見徐年生，〈戰後日本の中国政策の模索と日華關係の研究：1950年代を中心に〉，頁142。

<sup>57</sup> 「駐日大使館電文」（1956年12月5、6日），〈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案（第一冊）〉，《外交部》，檔號：031.3/0034。

<sup>58</sup> 「沈觀鼎致葉公超代電」（1956年11月28日），〈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案（第一冊）〉，《外交部》，檔號：031.3/0034。

<sup>59</sup> 〈張羣先生日記（九）〉，1956年9月25日，《中行廬經世資料》，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館藏號：群7/9。

所提意見。<sup>60</sup> 但是上述改變茲事體大，完全廢除對日檢查機構涉及多重的機關與法規，承辦的單位在政策與可行性之間的拿捏並不容易。按當時教育部國際合作委員蔣君章的回憶，部長張其昀交代研擬草案，他與張羣商量後決定四項原則：「其一，仍須審查；其二，行動要快，免使日人生疑；其三，不能進口者速退，能進口者速放，收到後三日內辦完；其四，多請些各方面的日文專家，待遇要厚，發放要快」。<sup>61</sup> 張羣稱善，張其昀也同意，但當蔣君章將要點條文化後，張其昀又稱總統認為「檢查」是野蠻行為，要求擬一個不檢查的檢查辦法。蔣君章認為窒礙難行，此事遂僵持不下。後來還是在張羣的催促與蔣介石的壓力下，以蔣君章的提案為基礎確立辦法，此即後來的「教育部外文書刊小組工作辦法」。

在日方一再要求下，終於在12月14日由張羣邀請何應欽、谷正綱、張其昀、沈觀鼎、沈昌煥、汪公紀等人，於總統府秘書室磋商日方提議，獲致重大結論。簡單而言，決議此機構定名為「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性質為促進政治、經濟與文化合作，並先檢討石井光次郎訪問團所提意見與問題，以及擬定委員名單。<sup>62</sup>

聯席委員會的擴大，意在加強雙方更多層面的交流，在彰顯兩國友好具有指標意義，但對於出版品進口一事，究竟是因此提高規格處理，抑或是被稀釋在其他議題當中，端看該問題在新組織中如何具體落實。

### 三、出版品談判的尾聲

1957年4月，第一屆中日合作策進會在東京召開。該組織下設政治、經濟及

<sup>60</sup> 〈中國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常務委員會第303次會議紀錄〉（1956年9月19日），《會議紀錄》，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檔號：會7.3/443。

<sup>61</sup> 蔣君章，〈追懷張其昀先生〉，收入中國文化大學張其昀先生紀念文集編纂委員會編，《張其昀先生紀念文集》，頁178；〈張羣先生日記（九）〉，1956年10月27日，《中行廬經世資料》，館藏號：群7/9。

<sup>62</sup> 此時擬定的成員中，谷正綱、黃朝琴、汪公紀、王撫洲、吳俊升等具官方身分，陳雪屏與羅萬俔為立法委員，楊雲竹、張伯謹與胡光泰為駐日大使館官員。參見「討論中日合作組織會議紀錄」（1956年12月14日），〈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案（第一冊）〉，《外交部》，檔號：031.3/0034。

文化三個小組，但不論是確立常態性小組成員或是討論議題，最初都是由文化小組展開，反映了策進會由出版品問題而來的淵源。

日方延續前一年石井光次郎訪問團的基調，第一個提出的議案即「推進日本書刊進口輸臺案」。<sup>63</sup> 在策進會規約與議程尚未決定的磋商階段，因日方積極提議出版品的輸入細節問題，因此雙方各派3位委員，先行討論可在公開會議上進行的議案。<sup>64</sup> 矢部貞治為日方代表之一，擔任文化方面議題的負責人。至公開會議時即由矢部貞治發難，重提兩國派代表設立聯合委員會共同審查，當然也再提前一年蔣介石也贊成此方式。陳雪屏答稱，自從石井光次郎訪問團來臺後，政府已起草新的日本出版品輸入辦法，放寬限制：不妨害反共抗俄國策、不為共匪宣傳、不妨害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sup>65</sup> 更重要的是，日本出版品除了書商取得政府許可這條管道之外，取得中華民國駐日大使館的許可亦可輸入。陳雪屏還特別舉例在「反共抗俄」的軍事體制下，對香港的中文雜誌與新加坡的英文雜誌亦以相同原則辦理，非單獨針對日本出版品。日方接受此變動，矢部貞治隨即表示不再堅持聯合委員會，而御手洗辰雄則開始將焦點轉向匯率限制的放寬，以及日本電影輸入配額的增加。就在確認交流原則後，雙方決定將具體問題移至文化小組討論，該小組臺灣方面由陳雪屏任委員長，成員為吳俊升（教育部次長）與張伯謹（駐日公使），日方則由矢部貞治任委員長，成員為赤松要與高山岩男。<sup>66</sup>

陳雪屏所言，是在策進會成立之前，於1957年2月由行政院核定的「教育部外文書刊小組工作辦法」。該工作辦法除了簡化進口原則，並增加小額參考用書（個人用書）的申請規定，學術性刊物還得交由各大學相關科系審查，擴大輸入

<sup>63</sup> 「文化合作報告」（1959年4月），〈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案（第五冊）〉，《外交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049/031.3/41。

<sup>64</sup> 日方為矢次一夫、矢部貞治與堀越禎三；臺方為陳雪屏、胡健中與黃朝琴。〈日華協力委員會懇談會記錄〉（1957年9月），《矢部貞治關係文書》，（日本）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圖書館藏，檔號：876/6/42。

<sup>65</sup> 〈日華協力委員會懇談會記錄〉（1957年9月），《矢部貞治關係文書》，檔號：876/6/42。

<sup>66</sup> 赤松要與高山岩男均為學界人士，赤松為一橋大學經濟學者，為「雁行理論」的創始者，高山當時為日本大學法學部教授，主攻哲學。〈日華協力委員會懇談會記錄〉（1957年9月），《矢部貞治關係文書》，檔號：876/6/42。



管道。<sup>67</sup> 簡而言之，在策進會成立之前，中華民國政府已決定片面地否決了聯席審查會，<sup>68</sup> 但藉由增加駐日大使館審查權力，以及新增其他輸入管道，有條件地擴大進口，保護審查權力不致旁落。

另一方面，矢部貞治的退讓舉動頗值得玩味。推敲雙方發言，矢部貞治或許將重點放在日本書商取得駐日大使館許可即能進口之辦法，果真如此當更為簡便。之後吳俊升暗示駐日大使館正就技術性問題進行協商，很可能在東京就能審查出版品，更增添想像。<sup>69</sup> 揆諸史實，最終大使館審查之事並未成真，但策進會成立之後各年也未再提及此事，出版品進口制度遂告穩定。

書籍與雜誌的談判告一段落，唯一尚有爭議的是日本報紙問題。1957年10月，第二屆策進會在臺北舉行，會中雖未提及此議題，但前駐美大使、日本外交界的前輩井口貞夫在會後向駐日大使館提出，要求先准進口《產業經濟新聞》，或從《產經週刊》開始。<sup>70</sup> 報紙問題一向複雜，此事經反共抗俄總動員運動會報文化組、國民黨中央宣傳工作指導委員會（以下簡稱「宣指會」），以及教育部外文書刊小組等單位研討，最後教育部核准《產經週刊》進口，宣指會則回復策進會，說明日本報紙銷臺最低條件：

1. 在內容上不採登匪幫通信社新聞及圖片，不轉載匪方報刊文字，並不作有利於匪幫之言論或記載。
2. 在稱謂上，對我須一律改稱中華民國，對匪幫則一律改稱「北京政權」或「毛政權」，並不得對毛匪澤東及周匪恩來加稱「主席」或總理字樣。

凡日文報刊能履行上述條件者，我國決歡迎其來臺行銷。<sup>71</sup>

<sup>67</sup> 「行政院令核准教育部外文書刊小組工作辦法」（1957年2月9日），〈教育部外文書刊小組工作辦法〉，《行政院檔案》，行政院藏，檔號：0045/1-1-8-10-2/23。

<sup>68</sup> 「陳慶瑜（行政院秘書長）致沈昌煥（外交部次長）函」（1957年3月12日），〈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案（第一冊）〉，《外交部》，檔號：031.3/0034。

<sup>69</sup> 〈日華協力委員會懇談會記錄〉（1957年9月），《矢部貞治關係文書》，檔號：876/6/42。

<sup>70</sup> 「駐日大使館致外交部代電」（1957年10月24日），〈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案（第二冊）〉，《外交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031.3/0035。

<sup>71</sup> 「中央宣傳工作指導委員會第二小組第六次會議紀錄」（1958年1月29日），〈中日合作

由於上述條件幾乎無法達成，等於是間接地拒絕開放。儘管後來針對日僑與部分政府官員實施嚴格的造冊進口管制，但一直至1970年代末期，日文報紙仍是高度管制物品。例如著名的政治案件「余登發案」被起訴理由之一，即是他卸下公職後，仍違法閱讀、解說與影印《朝日新聞》有關「匪酋黃華、葉劍英統戰文字」，成為「為匪宣傳」的證據。<sup>72</sup> 可知，遲至1979年一般臺灣人依舊無法自由閱讀日本報紙。整體而言，1957年之後日本出版品問題就未曾出現在策進會的談判桌。

在這段過去未被清楚疏理的談判過程中，彰顯了數個意義。首先，1950年代中期一連串的談判運作，基本上確立了1971年兩國斷交前日本出版品正式進口的審查標準與機制。1950年代前期嚴守邊境、高度禁止日本出版品的政策，正是經過此段時期的協商，在反映各自的需求下，擴大了進口的管道，並在法規上增加駐日大使館的審查權力。這不僅在日本出版品進口的歷史上屬劇烈轉變，在整體外國出版品進口制度上也屬特例。

其次，1950年代中期談判的特殊性，也反映出雙方成員的安排上，代表了對出版品問題不同的期待。日方在籌組訪問團與後來的策進會，一直堅守民間性質，同時避免太過政治性的表態。由於談判者多出身媒體界與學界，幾乎口徑一致地從言論自由立論，認為臺灣宛如戰時狀態的言論管制難以健全反共理論。臺灣方面則幾乎由業務主管單位的首長出面，顯示確實有意回應日方需求，但囿於反共國策及對日本前殖民母國殘留影響力的疑慮，只能儘量在技術環節上簡化，無法全面開放。

檢視談判過程與成員安排，其實留下了另一個問題：何以1950年代中期，雙方願意用如此不對等的方式，改變了出版品進口政策，還新增一條交流管道？從歷次談判可知，臺灣方面希望拉攏日本組成反共同盟的目標甚為明確，出版品放寬是回應日方交流要求的證明之一，但日方動機尚未明朗。考量當時日本左派思想盛行，對共產世界抱有高度興趣，這批人對臺灣已屬善意與同情，為何他們願

策進委員會案（第二冊）》，檔號：031.3/0035。

<sup>72</sup> 蕭李居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余登發案史料彙編（一）》（臺北：國史館、文建會，2008年），頁331-332、490-492。



意投入與中華民國政府的交流工作？以下將以日本重要成員的來臺脈絡為主軸，輔以臺灣方面的應對，進一步解析出版品問題是在哪些考量下被擺在談判桌上。

## 伍、出版品談判的政治脈絡

按上述談判的過程可知，1950年代中期出版品政策產生了部分的轉變，而這牽涉到兩國關係以及各自的國內因素。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日益穩固，美國、日本與臺灣各自有其考量。臺灣與日本在試探交流時，仍舊難以脫離中國因素，然而兩者對亞洲局勢的解讀、自身的利益，以及採取的手段並不相同，造成兩國建交以來的諸多齟齬。出版品管制的考量之一，可說就是「反共」策略的差異。然而，雙方又是有何強烈動機欲嘗試著拉近差距，突破既有的障礙？以下將先從政治脈絡說起。

### 一、石井與蔣的政治考量

訪問團團長石井光次郎來臺，主要背景是為了自由民主黨總裁選舉，而臺灣方面也高度看好他可能當上總理大臣，因此雙方往來相當熱絡。最直接的證據來自石井光次郎與蔣介石的會談紀錄，雙方盡吐心聲，毫不掩飾對彼此的期待。在此脈絡下，出版品進口成為證明雙方友好的標誌，不得不鬆動原有的管制政策。

日本政界的劇烈變化，促成了石井光次郎來臺的重要背景。1955年所謂的「保守合同」促使自由民主黨成立後，各種政治勢力激烈競逐，對外政策成為標舉政治路線的重要區隔之一。日本戰後初期的首相吉田茂，在對外立場上以美國為中心，但部分人士對於他一面倒的親美立場並不苟同，自民黨成立的背景之一即有修正吉田路線的面向。<sup>73</sup> 在此情形下，首任總裁及首相鳩山一郎力主恢復日本與蘇聯的邦交，試圖走出以美國馬首是瞻的新外交路線。<sup>74</sup> 1956年年底自民黨

<sup>73</sup> 北岡伸一，《自民党 政權党の38年》（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4年），頁70。

<sup>74</sup> 中北浩爾，《一九五五年体制の成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4年），頁183-186。

再次進行總裁選舉，對外路線成為劃分系譜的重要指標之一。<sup>75</sup> 其中最有力的候選人有三：一是試圖在日本自主外交與對美協調之間尋求平衡的岸信介；二是後來尋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石橋湛山；三是繼承舊吉田派的石井光次郎。<sup>76</sup> 石井光次郎刻意選前來臺，係在日本政壇致力西進的熱潮中，冀望善用中華民國政府的期待，強化與臺灣的交流管道，不啻為另闢蹊徑、厚植實力的戰略，有利增加自己在黨內路線競爭時的發言權。



圖1、蔣介石為石井光次郎慶生照

資料來源：「總統蔣介石以茶會招待日本訪華團團長石井光次郎」（1956年8月18日），〈總統蔣公影輯—接見外賓（六）〉，《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50106-00006-011

石井光次郎訪臺共與蔣介石會見三次，其中兩次單獨會面，談論主題正是圍繞著日本政情與總裁選舉。石井光次郎在第一次單獨會談（8月18日）時，為蔣介石講述日本政界立場，批評現任首相鳩山一郎對蘇聯立場太過天真，他所屬的

<sup>75</sup> 中北浩爾，《自民党政治の変容》（東京：NHK出版，2014年），頁16-18。

<sup>76</sup> 必須說明的是，這三人的路線是比較性而非絕對性，例如相對於吉田茂強力主張對美協調，石橋湛山與岸信介則顯得對美自主，但若是石橋湛山與岸信介兩人相比時，岸信介反而屬於對美協調。又例如此時相對於石井光次郎，岸信介偏向對美自主，但不代表反對親近中華民國政府，岸信介一向被視為親臺派的核心。參見北岡伸一，《自民党 政權党の38年》，頁80-85；新井雄，〈日本自由民主黨友台派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4年），頁14-20。

舊自由黨人同仁均主對蘇強硬，同時為蔣介石說明原欲與蘇聯談判的重光葵，因北方領土問題，日本政府已命令結束談判。然後說出了他此行的最重要目的：

日本現已面臨必須澄清局勢走向明朗化之時機，決不容再持兩端作左右逢源之想，否則必將自貽伊戚。深信鳩山退場後，日本之局勢必趨於明朗，小處或不免有所出入，但大端當不致有過甚之偏差。此次來訪，實係以此心境與期待而來，切盼 總統閣下能賜以支持。<sup>77</sup>

此言已甚露骨，但蔣介石未立即正面回應，只云日蘇談判不成甚感安慰。此時有個插曲，蔣夫人宋美齡入席，為訪華期間生日的石井光次郎祝壽，略話家常後退席（圖1）。二人話題本應遠離，但石井光次郎再提總裁選舉。然而蔣介石依舊不動聲色，反問兩國應如何合作之事，並表達了與出版品問題緊密相關的立場：「深盼多加研究，能將具體問題，付諸行動。作為兩國合作之良好開始」。<sup>78</sup>終該次會談，蔣介石均未表達任何承諾。由於此會談是在雙方正式談判之前，蔣介石一方面暗示石井光次郎此行應致力達成某些具體成果，以做為支持與否的判準，但另一方面也表達期待某些具體事情必須能展現雙方合作的精神。筆者認為，日方一直念茲在茲的出版品管制，在此時已出現了改變的可能。

8月22日，石井光次郎再次單獨與蔣介石會面，在多次請求中華民國政府協助日本商界與東南亞華僑聯繫未獲明確答覆後，話題又再轉向政治層面，回憶兩人共同好友緒方竹虎。蔣介石說起是他促使緒方竹虎策動保守政黨合作，用以抵禦蘇聯。石井光次郎則又再提選舉，表示自己願意承擔起反共的立場。此時蔣介石終於說出了石井光次郎最期待的話：

此次余有一最重要之言相告。君如當選總裁，萬不可謙辭，必須毅然出任時艱，此不獨為日本，亦為東亞，如欲我相助，我方力量雖微，當為盡其所能。余意日本今日須有一堅強之政治中心力量，保守黨必須有領袖領導，否則不足以應付共產主義之攻勢。<sup>79</sup>

<sup>77</sup> 「總統召見日本訪問團團長石井光次郎談話紀錄」（1956年8月18日），〈對日本外交（四）〉，《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106-00067-004。

<sup>78</sup> 「總統召見日本訪問團團長石井光次郎談話紀錄」（1956年8月18日），〈對日本外交（四）〉，《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106-00067-004。

<sup>79</sup> 「總統召見日本訪問團團長石井光次郎談話紀錄」（1956年8月22日）〈對日本外交

蔣介石的期望很單純，係希望培植一個反共立場更明確的日本首相，完成其心中的亞洲反共同盟，因此對石井光次郎多有優遇。<sup>80</sup> 石井光次郎個人的期待也很簡單，在爭取總理大臣位置最關鍵的前夕，來臺希望構築政治外援。有趣的是，即便日方一直強調訪問團是民間性質，他們確實也無法代表官方，但團長本人確是抱持著政治目的而來，接待的蔣介石當然也是從政治層面考量，因此對於出版品的處置，也就有因政治考量而刻意放寬的可能。

## 二、保守派智庫的臺灣認識：矢次一夫與國策研究會

石井光次郎個人的抉擇固然可以放在以自民黨為主的政治勢力競爭中理解，但其他訪問團成員與中日合作策進會的參與者，卻無法完全在此脈絡中解釋。<sup>81</sup> 成員中沒有其他的自民黨議員，石井光次郎的派系色彩並不深，反而是智庫團體國策研究會的成員占了多數，因此有必要理解該研究會的性質，及來臺的目的。

矢次一夫的生平已介紹如前，但有關他的志趣以及所創建的國策研究會，是抱持什麼態度與臺灣交流，仍有待釐清。先從個人而言，矢次一夫雖然因促成了中日合作策進會，被視為臺灣派，但從他本人的言論及作為來看，他著眼的是提升日本在亞洲政治中的地位，他對臺灣的觀察與行動，實則奠基於日本利益。1955年他與著名中國史學者中嶋嶺雄的對談中表示，亞洲有三個「中國」：在北京的共產中國、臺北的自由中國，以及新加坡的新中國，三者的動向深刻影響日

---

（四）》，《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106-00067-004。

<sup>80</sup> 晚宴上團員御手洗辰雄積極說服宋美齡訪問日本，宋幾經考慮後詢問蔣介石是否能前往？蔣介石答以等石井先生組閣後我們再一同前去，頓時滿室沸騰。矢次一夫，〈自由中国親善訪問に関する報告（二）〉，《新國策》，第4卷第27期（東京，1956年10月），頁8。來臺期間適逢石井光次郎生日，蔣介石邀請他至官邸享用蛋糕及宋美齡製作的壽麵，可見特別招待之意。石井光次郎，《回想八十八年》，頁401-402。

<sup>81</sup> 「接待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政治小組第一次談話會速紀錄」（1956年8月20日），〈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訪華（三）〉，《外交部》，檔號：045/012/22。有別於官方的期待，後來亦有觀察指出到了中日合作策進會時期，石井光次郎的派系力量下降，其政經力量及媒體效應並不如臺灣方面所設想。司馬桑敦，〈從東京看中日合作策進會議〉，收入司馬桑敦，《中日關係二十五年》，頁33-38。

本。<sup>82</sup> 若日本與自由中國合作，將可爭取海外華僑，強化在東南亞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競爭。<sup>83</sup> 1980年矢次一夫帶領《朝日新聞》編輯局長細川隆元與三菱重工社長河野文彥前往中國北京，與國務院總理華國鋒、副總理鄧小平會談。在美國甫與中華民國斷交的情況下，此行被視為「親臺派」的轉向，但他的回應卻是此舉乃基於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美日中（PRC）三國應成為亞洲對抗蘇聯的核心，因而希望能強化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聯繫。同樣基於抗蘇的立場，他也認為斷交後的美國可透過「臺灣關係法」介入臺灣海峽，實質上封鎖蘇聯艦隊通過，但若是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省」，美國就無法插手，因此臺灣維持現狀對日本並不壞。<sup>84</sup>

由上述矢次一夫的言行來看，明顯與中華民國政府堅壁清野的反共立場大相逕庭。矢次一夫在1950年代聯繫臺灣，60年代與韓國交流，80年代與中國往來，為的都是確保日本在變局中的優勢地位。而他從戰前調解左右派勞工爭議，戰後在朝鮮半島南北，也在臺灣海峽兩岸間遊走，顯示矢次對合縱連橫的興趣，恐怕遠大於堅守「親臺派」這種單一國家的外交管道。這也可以解釋前述何以矢次一夫與團員不願對加入反共同盟表態，而矢次一夫對於出版品開放的要求，顯然也難以出自純粹的文化交流。

而在矢次一夫的籌組下，國策研究會成員加入訪問團與促進會的比例頗高。<sup>85</sup> 但國策研究會是何種團體？對臺灣是抱持什麼態度？有關國策研究會的歷史源起於第二次中日戰前，1933年矢次一夫與貴族院議員大藏公望等人組織國策研究同志會，1936年改為國策研究會，由矢次一夫擔任事務局長。如同其名，該會主要業務為針對國家各方面政策進行研究，並將結果向政府提出報告；迨中日戰爭爆

<sup>82</sup> 橋本文男，《昭和史を動かす男・矢次一夫》（東京：山手書房，1980年），頁30-36；矢次一夫，《わが浪人外交を語る》（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1973年），頁20。

<sup>83</sup> 矢次一夫，〈自由中国親善訪問に関する報告（二）〉，《新國策》，第4卷第27期，頁7-8。

<sup>84</sup> 橋本文男，《昭和史を動かす男・矢次一夫》，頁38。

<sup>85</sup> 石井訪問團25人中，雖僅6人為國策委員會成員，但均位居該會要職（參見表2），而非成員的經濟小組人士，多為矢次一夫在經濟界的人脈。第一屆中日合作策進會日方15位委員中，則有8位是國策委員會委員，可見其份量。參見矢次一夫，〈国策研究会小史〉，《わが浪人外交を語る》，頁401-403。



發後，也將觸角延伸至軍部所關心的事項，然而隨著戰爭情勢越趨嚴峻，1945年3月會務中斷。<sup>86</sup> 經歷盟軍占領時期的壓制，國策研究會1953年恢復，仍以綜合型政策研究機構自居，與政府、各黨派與產業界保持緊密關係，構築資訊交流與研討政策的平臺，在必要時協助日本政府進行官方不便進行的外交工作。<sup>87</sup>

作為綜合性智庫，他們與臺灣的淵源顯然不深。他們大多第一次訪臺，且來臺的行程多已受安排，難以接觸一般臺灣人，大幅限制了他們對臺灣的認識。<sup>88</sup> 他們在行前對臺灣的認識基礎是臺灣處於戰爭狀態，有興趣的是中華民國政府如何守住這彈丸之地，並預設臺灣是一個經濟未發展且民心浮動的地方。<sup>89</sup> 來臺後則觀察到臺北街頭沒有乞丐，犯罪活動很少，市街氣氛安定，基本物資在美國支援下也不虞匱乏，反而感到驚奇而有良好印象。<sup>90</sup> 另外，國策研究會的成員普遍給予蔣介石相當高的評價。在實際碰面後覺得蔣介石像是高僧般有信念的偉人，與史達林（Joseph Stalin）、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等獨裁者不可歸於一類，而這緣於蔣介石在二戰後對日僑遣送等外交政策的肯定。<sup>91</sup> 這正是日後「親臺派」結成的主要基礎之一，也顯現國策研究會的政治立場。

正是基於對臺灣處於戰時狀態的認識，因此訪臺成員多對臺灣文化情況感到憂心。御手洗辰雄回國後以〈徹底的言論統制 學問上的鎖國狀態〉為題，報導當時臺灣限制外國出版品的嚴酷現象。該文指出臺灣處於比日本戰時還更嚴厲的言論統制，從一般性到專業性的出版品皆嚴格限制進口，日本報紙只有一家名不見經傳的低俗報紙（指《內外時報》），雜誌只有兩份婦女雜誌，並以日本戰

<sup>86</sup> 橋本文男，《昭和史を動かす男・矢次一夫》，頁84-87。

<sup>87</sup> 「趣意書」，收入橋本文男，《昭和史を動かす男・矢次一夫》，頁109-110。有人則直接將國策研究會視為石井派的外圍智庫。參見司馬敦桑，〈從東京看中日合作策進會議〉，收入《中日關係二十五年》，頁34。

<sup>88</sup> 矢次一夫，《わが浪人外交を語る》，頁15-16。

<sup>89</sup> 〈日華両国の友好を希って〉，《新國策》，第4卷第21期（東京，1956年8月），頁2-3。

<sup>90</sup> 御手洗辰雄，〈中国と日本と〉，《新國策》，第4卷第24期（東京，1956年9月），頁2。

<sup>91</sup> 細川隆元，〈台灣隨想〉，《新國策》，第4卷第23期（東京，1956年9月），頁11；西尾末広，〈笑顔に見る台湾の将来〉，《新國策》，第3卷第25期（東京，1955年9月），頁5-6；松岡駒吉，〈友好合作の道〉，《新國策》，第5卷第25期（東京，1956年9月），頁1-2。團長石井光次郎也在回憶錄中特別記述對蔣介石的敬佩之意。石井光次郎，《回想八十八年》，頁400-401。

時為例，認為沒有言論自由將降低對其他思想的吸收力與抵抗力。<sup>92</sup> 細川隆元直言，所謂「中日文化交流」只能由日本單方面供給，「中國文化水準之低，實出本人意料之外」。<sup>93</sup> 矢部貞治也對臺灣的言論自由狀況嚴厲批判，不只一次在公開場合、甚至在蔣介石面前提及，無法理解臺灣何以查禁批判社會主義不遺餘力的經濟學家小泉信三的作品。<sup>94</sup> 矢部貞治認為，捍衛自由不該用限制自由的方式進行，如果反對共產專制主義卻限制了言論自由，將使得自己也成為極權體制。<sup>95</sup> 反過來說，由於日本學術、出版與文化界多元並陳，扣除少數倡導共產主義者，當能協助臺灣開拓眼界。<sup>96</sup>

對戰時狀態高度敏感（言論統制），並預設戰時社會狀態（物資匱乏），或許與成員們在二戰中的經驗有高度相關，他們深知資訊閉鎖造成國民對國際情勢的不了解。因此，當臺灣方面要求日本不再與共產集團接觸，甚至要求日本宣布共產黨為非法，日方始終主張日本以「自由」反共，面對臺灣方面的不斷指責，反而認為是強硬的洗腦。<sup>97</sup> 換言之，為了阻擋臺灣方面過於醒目的政治目的，日本出版品問題成為確保文化交流色彩的攻防焦點。

整體而言，日本出版品進口問題對矢次一夫及其所主持的保守派智庫而言，充滿了主客觀上的期待與困難。從矢次一夫的作為來看，他對於建立交流組織的

<sup>92</sup> 御手洗辰雄，〈徹底した言論の統制 学問的には鎖国状態〉，《読賣新聞夕刊》，東京，1956年9月17日，版1。

<sup>93</sup> 細川隆元，〈文化界の現況〉，《新國策》，第4卷第24期，頁10-11。此為外交部所譯版本，意謂臺灣亦注意團員返日後相關言論。「葉公超致張羣函」（1956年11月10日），〈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訪華（二）〉，《外交部》，檔號：045/012/22。

<sup>94</sup> 小泉信三曾任慶應大學校長，雖反對共產主義但又對此有深入研究，為日本重要經濟學者。

<sup>95</sup> 矢部貞治，〈學術の交流について〉，《新國策》，第4卷第24期，頁11。

<sup>96</sup> 「接待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文化小組座談會速紀錄」（1956年8月22日）；「反共座談會速紀錄」（1956年8月21日），〈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訪華（三）〉，《外交部》，檔號：045/012/22。

<sup>97</sup> 鍋山貞親，〈再訪に想う〉，《新國策》，第4卷第25期（東京，1956年9月），頁3-4；御手洗辰雄，〈中国と日本と〉，《新國策》，第4卷第24期，頁2。這個辯論由來已久，從張道藩訪日時，負責文化方面的陳雪屏和左舜生與日方的嘉地隆一和鍋山貞親辯論，臺灣方面認為可犧牲部分自由反共，但日方則認為應以自由反共。參見「中華民國各界代表日本親善訪問團の滞日中における言動に関する報告書」（1956年4月2日），〈日本各界中華民國親善團關係石井光次郎團長（一九五六・八）〉，《戰後外交記錄》，檔號：A'-0389。



興趣遠高於爭取出版品進口標準的放寬，對臺灣戰略地位的思考，也不易使他有透過出版品加深兩國彼此認識的想法（本質性），文化交流對他而言較像是兩國親善的證明之一（工具性），但這也是促使他願意奔走聯繫、築起交流管道的重要動力。而以國策研究會為主體的團員們，基於反對共產黨以及對蔣介石「以德報怨」的情感，有別於當時日本的政治風潮，願意訪臺並進行交流，但在實際行動上則不打算配合中華民國政府，刻意淡化政治色彩，強調文化與經濟合作，這促使他們熱心於出版品問題。不過，有限的接觸機會和自身經驗，使他們對臺灣的認識集中於政府高層與戰時狀態，並沒有機會真正了解民間的需求。他們用協助臺灣開拓眼界的立場，為日本多元自由的出版界辯護，但他們其實都歷經日本戰爭時期，深知要求戰時政府開放言論的困難。這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略帶書生氣息的思考方式，在矢部貞治身上更加明顯。

## 陸、出版品談判的知識脈絡

矢部貞治在歷次會議中的發言已如前述，作為中日合作協進會文化小組召集人，是日方負責談判出版品問題的主要人物。但他是何種背景、如何影響他的上述發言呢？以下將從其個人經歷和其所援引的知識社群出發，疏理日方推動出版品出口的知識脈絡。

### 一、矢部貞治經歷與出版品問題

矢部貞治的基本簡歷已如前所述，而他生平對知識與實務運用的選擇，頗能反映他持守「中道」（不偏向左派）的政治立場，以及對言論自由的堅持。他來臺時擔任校長的拓殖大學，從戰前以來所延續的海外現地調查傳統，也呈現於文化小組的成員中。從他身上，可以看到別於政治面向的知識脈絡。

矢部貞治並非是完全在象牙塔中的學者，對於如何運用其政治學專業，強化日本的民主體制以及在世界中的地位深有興趣。他在東京大學歷任助手、助教授與教授共計二十年，太平洋戰爭時期加入後藤隆之助組織的昭和研究會，思考如

何由下而上地整合國民力量，以改革官僚統制與政黨無力化的弊病，並將研究結果送給首相近衛文麿。然而日本政府成立的是由上而下的大政翼贊會，與矢部貞治的理想相距甚遠，遂與政府無涉。<sup>98</sup> 不過，當戰後聽到美國占領軍發布近衛文麿的逮捕令時，他仍決定請辭東大教授職位，並謝絕一切邀請，以自我放逐的方式當了六年的「浪人」，直到1952年方擔任早稻田大學講師，1955年時受邀擔任拓殖大學校長，並參與憲法調查委員會與公安審查委員會。<sup>99</sup> 矢部貞治的著作頗豐，偏重政治學、民主制度與憲法的理論與實際運作，並在浪人時期撰寫近衛文麿傳記，檢討日本戰時經驗。<sup>100</sup> 由其經歷來看，矢部貞治將政治學與國家命運相互聯結，主張民主制度，無法接受否定人性尊嚴的法西斯主義，也無法信服共產主義或帝國主義，在戰前與戰爭時期受到右翼陣營與政府壓力，在戰後也別於盛行左派的主流，可謂不畏時代風潮，始終抱持一貫的理念，欲協助日本鞏固民主制度的學者。<sup>101</sup>

矢部貞治與矢次一夫的淵源甚為深厚，但二人在1950年代國策研究會重建時期卻稍顯疏離。戰前矢部貞治參與國策研究會頗深，平時積極參與會議。1945年3月，國策研究會的會務中斷，但矢次一夫在該年6月與金森德次郎（後吉田茂內閣國務大臣）、古垣鐵郎（時任《朝日新聞》記者）等共商結束戰爭的計畫。<sup>102</sup> 特別是戰後初期矢次一夫籌組新政研究會與民主協同黨，矢部貞治不僅均參與其事，後者的成立宣言亦由矢部貞治所撰。<sup>103</sup> 然而矢次一夫在解除政治禁錮，1953年重建國策研究會時，矢部貞治卻未積極參與，但當矢次一夫邀請他參加此次的訪問團時，他倒是沒有拒絕。

基於對民主鞏固的信念，矢部貞治在出版品問題上一再表明言論開放與反共的關係。從被安排至金門參訪、看到文化思想上的管制，以及在歷次會談中臺灣

<sup>98</sup> 坂田善三郎，〈東大時代の矢部先生〉，《海外事情》，第10卷第10期（東京，1962年10月），頁36。

<sup>99</sup> 矢部貞治，〈自伝的随想〉，《海外事情》，第7卷第2期（東京，1959年1月），頁3。

<sup>100</sup> 〈矢部貞治博士略歴〉、〈矢部貞治博士著作表〉，《海外事情》，第10卷第10期，頁2-5。

<sup>101</sup> 草野文男，〈戦後における矢部博士〉，《海外事情》，第10卷第10期，頁49-51。

<sup>102</sup> 橋本文男，〈昭和史を動かす男・矢次一夫〉，頁84-87。

<sup>103</sup> 矢次一夫，〈わが浪人外交を語る〉，頁389-391。

官員的回答，矢部貞治知道臺灣處於戰時體制之下。矢部貞治清楚知道戰時如何管制言論，但他仍認為，對共產主義最好的「免疫」方式不是隔絕，而是應該確保開放與自由批判的空間。另外，如果連電影等娛樂性產物被高度限制，或是日本批判共產主義的權威學術著作無法進口，矢部貞治悲觀地認為臺日雙方無法進行真正的文化交流。<sup>104</sup> 矢部貞治也對蔣介石宣布放棄對日求償，以及對於多次與共產黨周旋的國民黨抱有深切好奇。他認真閱讀《蘇俄在中國》日文摘譯版，希望能吸取與共產黨鬥爭失敗的經驗，並解答何以蔣介石能自信地認為五年內可以「反攻大陸」成功。<sup>105</sup> 基於政治立場與學術理由，促使矢部貞治認真理解臺灣，而這也反映在他對出版品問題的善意期待之中。

矢部貞治除了從學術和言論自由角度思考出版品問題，亦就實務層面考察。在矢部貞治的資料中，存有名為〈向臺輸出日本出版品的瓶頸〉的手稿。此份稿件未知書寫年代，但內文從貿易障礙的角度剖析日本出版品輸臺的困難，約可推知是矢部貞治在接觸日本業界後所寫下的觀察。他認為日本出版品輸出至臺灣的障礙有三：貿易配額過少、審查時間太長，以及出版品價格太高。文中道出當時臺灣輸入日本出版品的實況，由於臺灣不准新設貿易商社，只能由既有的十二、三家商社負責出版品輸入，實際運作的只有五家。這些商社手上握有兩三件輸入許可權，每個月只能行使一件，因此商社必須輸入最有利益的商品如文具或機械，如此便壓縮了出版品輸入的空間。另外，由於換匯配額太少，必須購買黑市外匯，墊高的成本轉嫁給消費者，出版品在臺價格約為在日本的兩倍半。<sup>106</sup> 矢部貞治也與「出版文化國際交流會」接觸，該單位負責將日本出版品輸出至全世界各地，並整合日本出版社對外參加書展，該會曾在1955年舉行第一次的海外日本書籍展覽會，其地點即在臺北。<sup>107</sup>

矢部貞治對共產主義的不信任感，讓他別於同時代的日本學術界人士，願意

<sup>104</sup> 矢部貞治，〈國民政府訪問の感想〉，《海外事情》，第4卷第11期（東京，1956年11月），頁17-22。

<sup>105</sup> 矢部貞治，〈中国のかなのソ連〉，《海外事情》，第5卷第9期（東京，1957年9月），頁23-30。

<sup>106</sup> 矢部貞治，〈台湾への日本出版物の隘路〉，《矢部貞治関係文書》，檔號：6118/34/220。

<sup>107</sup> 〈PACE50年の略史（1953年-2003年）〉，收入出版文化國際交流會50年史編集委員會編，《出版文化国際交流会50年史》（東京：出版文化國際交流會，2003年），頁128。

到臺灣交流，但他對臺灣言論管制的憂心，也對交流感到重重阻礙。他對臺灣出版狀況的記述，符合當時的進口經銷商制度，以及外匯限制進口數額的實況。從這些言行來看，矢部貞治應該是1950年代中期對臺灣出版品問題了解最深入、也對文化交流抱持最純粹意義的人士之一，而促成他這麼做的動機，還可能來自另一個源自戰前的知識脈絡。

## 二、海外現地研究與臺日民間交流

矢部貞治所參與的知識社群，可能也影響他如何思考出版品問題。矢部貞治在1955年接任拓殖大學校長時，結合該校向海外發展的傳統，成立了「海外事情研究所」，頗能展現為何他願意與臺灣接觸交流的理由。拓殖大學前身為臺灣協會學校，目的在培養殖民臺灣的人才，該協會領袖為曾任臺灣總督的桂太郎。隨著日本殖民地擴大，該會改為東洋協會，學校也歷經多次改制與改名，與日本帝國主義的發展息息相關。<sup>108</sup> 戰後因東洋協會被廢，校務曾一度困頓，1955年時該校重整方向，以「學者校長」為目標，敦聘矢部貞治來校，而與其上任幾乎同步成立的海外事情研究所，可說是實踐矢部理念的重要事業。<sup>109</sup>

海外事情研究所為調查研究單位，由矢部貞治結合校外學術人脈所設立，其背後蘊藏的是矢部貞治與所謂「中道」立場研究者對日本戰敗的反省。<sup>110</sup> 該研究所設立目標在於從亞洲出發，對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實態進行現地實證調查，其具體的工作包括進行歷史研究、現況分析、市場原料、商品、物價調查、移民、合作事業調查，以及學術文化的交流等。<sup>111</sup> 矢部貞治認為，日

<sup>108</sup> 拓殖大學創立百年史編纂室編，《東洋文化協會五十年史稿》（東京：拓殖大學，2011年），頁83-89；何義麟，〈臺灣協會〉，收入「文化部臺灣大百科全書」：<http://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5820>（2019/8/31點閱）。

<sup>109</sup> 拓殖大學六十年史編纂委員會編，《拓殖大学六十年史》（東京：拓殖大學六十年史編纂委員會，1960年），頁352-353。臺灣協會等臺灣關係團體在戰後的變化，可參見鍾淑敏，〈戰後日本臺灣協會的重建〉，收入許雪姬主編，《臺灣歷史的多元傳承與鑲嵌》（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4年），頁69-121。

<sup>110</sup> 草野文男，〈海外事情研究所設立初年度事業報告の件〉，收入百年史資料集編集委員會編，《拓殖大学百年史 資料編五》（東京：拓殖大學，2007年），頁181-187。

<sup>111</sup> 「拓殖大学海外事情研究所定款」，《海外事情》，第3卷第10期（東京，1955年10

本過去失敗的原因在於僅重視自身的發展，未體認到與周邊國家共同發展的重要性。是以日本未來的發展之道，只有奠基在亞洲的自主與繁榮，應該設法與各民族合作，協助他們發揚亞洲固有文化、導入近代科學技術，協助開發資源，進行農業改革等工作，這是補償日本過去所犯過錯的唯一方法。<sup>112</sup>

因此，矢部貞治希望該所的調查研究能基於了解異民族的立場，致力於疏通彼此的觀念、習慣與想望，以期使日本能和亞洲各民族友好合作。<sup>113</sup> 這其中也隱含了矢部貞治接任拓殖大學校長的用意，希望在二強對立的美蘇冷戰結構中，尋求日本自主獨立之道，接續拓大獻身海外、不惜埋骨異地的傳統，培養學生在新時代中以平等的立場與亞洲諸民族真誠合作，以開拓日本的前途。<sup>114</sup>

矢部貞治一方面反省戰前拓殖大學帶有殖民色彩的知識情報，另一方面希望接續海外現地調查的傳統，希望能補足戰後十年對亞洲各地現況理解的知識空白。在此理念下，他在日本政治與學術界傾心於左派思想且熱衷與共產國家交流之際，前來臺灣現地觀察，並以大學校長之姿主持文化小組，企圖說服中華民國政府放寬出版品限制，展現言論自由之外更深一層的關懷與理念。同時，他也引入海外事情研究所的成員高山岩男、鍋山貞親與赤松要，成為石井光次郎訪問團及中日合作策進會的成員。這些帶有戰前亞洲研究傳統的學者，在面對新時代日本如何與亞洲周邊國家交流的趨力下，推動了日本出版品向臺灣輸出的工作，呈現一個有別於政治脈絡的圖像。值得一提的是，臺灣方面的談判代表囿於官職，在此議題上展現的是執行政府政策，較難看到個人學養的影響。

有關臺灣方面交流管道的淵源，前已述及，為了因應石井光次郎訪問團的民間性質，臺灣方面以亞盟中國總會與中日文化經濟協會兩單位聯合邀請。前者反映當時中華民國政府對於日本的期待，後者則是在策進會之前，臺日交流的另一

月），頁69。

<sup>112</sup> 〈拓殖大学海外事情研究所設立趣意書〉，收入百年史資料集編集委員會編，《拓殖大学百年史 資料編五》，頁528-530。

<sup>113</sup> 草野文男，〈「新生亞細亞」より「海外事情」へ 本誌の改題と發展〉，《新生亞細亞》，第3卷第9期（東京，1955年9月），頁67。

<sup>114</sup> 坪内隆彦，〈理事会関係文書に見る国際貢献—昭和二六（一九五一）年~平成一二（二〇〇〇）年まで—〉，《拓殖百年史研究》，第9期（東京，2002年3月），頁71-81。矢部貞治，〈日本の國際的在り方〉，《海外事情》，第3卷第10期，頁12-18。



重要管道。該會成立於1952年，由張羣擔任理事長，黃朝琴、雷震、張其昀任第一屆常務理事（任期：1952-1954年），雷震（任期：1952-1956年）與汪公紀（任期：1956-1960年）曾任幹事長，而張其昀（任期：1952-1953年）與陶希聖（任期：1953-1982年）則任該會下設的文化委員會主任委員。<sup>115</sup> 上述成員身兼多個要職，也都參與石井光次郎訪問團與策進會的文化小組活動，可視為中國大陸時期對日人脈的延續。不過該會較偏重處理經濟交流最基層問題，較少觸及文化決策層面的問題；二來他們仍需服膺來自最高層的政策指導，其個人經歷與該團體在出版品談判中的角色，相對日方而言顯得模糊，有待進一步探索。<sup>116</sup>

## 柒、結論

經由本文的爬梳分析，可知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基於各自國內的政治需求，以及對東亞冷戰局勢的解讀，將彼此推上談判桌，於1950年代中期促使中華民國政府一定程度放寬了日本出版品的進口質量與途徑。同時，本文也認為日方繼承戰前以來赴海外現地調查與認識亞洲的知識傳統，意欲填補對臺灣的現實認識，作為重建與日本周邊國家關係的基礎，是政治思考之外的知識脈絡。然而，日方對臺灣的戰略想像與有限認識，以及中華民國將擴大出版品進口視為拉攏日本反共勢力的示好手段，皆使雙方難以真正藉此事業促進彼此認識，也限縮了談判層級與持續性，遂使日本出版品在臺灣進口範圍始終受限，影響臺灣人吸收外來資訊的管道。

本文首先結合中華民國對日本出版品進口政策的研究成果，重建過去較少被疏理的談判過程，解決戰後臺灣日本文化輸入的基本問題：何時、何人、以何種

<sup>115</sup> 洪紹洋，〈戰後臺日交流下的中日文化經濟協會（1952-1972）〉，《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63期（2017年4月），頁93-97。

<sup>116</sup> 有關該會的定位來自上述洪紹洋的研究。另外，黃克武教授提示陳雪屏整合北京大學知識分子的經驗、陶希聖的汪派背景，以及張羣豐富的對日人脈，可以探問蔣介石是用哪些人負責對日文化交流之議題，深具啟發。黃克武，〈綜合評論〉，「冷戰時期日本與「中華圈」（中國大陸·香港·臺灣）的人物交流史國際研討會」，東京：日本東洋文庫，2021年9月10日。

方式協商，並造成何種結果。臺灣從1945年二戰結束以來，官方對輸入日本文化設下多重限制，一直到1956年石井光次郎訪問團來臺啟動談判，才出現改變的契機。日方雖由國會議員領軍，但團員多產業界與文化界人士，屬民間性質；臺灣則多為教育、宣傳和新聞單位的黨政主管。談判雙方的層級差異，反映了日方人士對臺灣的特殊需求，以及臺灣重視此事，但雙方立場差異過大，談判初期並不順遂。

真正鬆動出版品管制的主角為蔣介石。石井光次郎訪問團利用拜會蔣介石的機會，直接獲得首肯，同意雙方在東京設立出版品審查聯席會，向蔣介石當面提出此議的拓殖大學校長矢部貞治，以及回國後將此事披露於大報的記者御手洗辰雄，是當中的關鍵人物。但臺灣官僚們為了避免審查權力旁落，在國策研究會幹事長矢次一夫與總統府秘書長張羣協調下，聯席會擴大為政治、經濟與文化全面性的交流組織，亦即「中日合作策進會」。1957年策進會成立後第一個討論案即是針對出版品進口，確實部分放寬了日本出版品進口限制，相關政策方向維持至兩國斷交為止。

考察完談判過程並了解日本出版品進口政策的轉折後，本文分析日本在1950年代中期這個特殊的時間點，何以基於政治脈絡與知識脈絡，向臺灣要求擴大出口出版品。在政治方面，1955年日本自由民主黨成立，外交路線成為各政治勢力競爭的焦點之一，時值石井光次郎角逐自民黨總裁，來臺之舉可視為厚植政治資本、有利黨內競爭的手段。而蔣介石也有意藉他提升日本的反共政治力量，於石井光次郎來臺期間多所優遇，決意讓訪問團有具體的交流成果，這可說明上述日本出版品管制鬆動的政治考量。

實際負責籌組來臺團體的矢次一夫，以及其創設的國策研究會是這波交流活動中的主體，則是抱持另一種政治思考。矢次一夫希望拉攏臺灣以建立華僑交流管道，目的在擴大日本的國際地位，而非透過出版品加深兩國彼此認識的想法。而以國策研究會為主體的團員們，基於反共立場與感激蔣介石「以德報怨」的情感，使他們有別於當時日本的政治風潮，願意訪臺並進行了解，但有限的接觸機會和自身經驗，使他們對臺灣的認識集中於政府高層與戰時狀態，並沒有機會真正了解民間的需求。上述的政治思考使他們來臺，但也限制了他們對出版品問題的興趣。

日方負責談判出版品問題的主要人物矢部貞次，其個人理念及所屬知識社群，則反映了知識脈絡。矢部貞治主張民主制度，無法接受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或帝國主義，使他也不畏時代風潮，願意來臺一探究竟。他批判中華民國政府的出版品進口政策違反言論自由，但也理解處於戰時狀態下的不得已，遂如講學般諄諄教誨，反覆陳述言論自由與學術自由對於強化反共精神力量的重要性。而他所接掌的拓殖大學，一方面反省戰前帶有殖民色彩的知識情報，另一方面接續該校海外調查研究的傳統，因此他成立海外事情研究所，希望能補足戰後十年對亞洲各地現況理解的知識空白，藉由累積情報與文化交流重建日本與周邊國家的新關係，這使得其願意擔任出版品談判的要角，並援引了海外事情研究所的成員參與談判，展現別於政治計算的知識脈絡。反之，臺灣方面的談判人員，許多具有戰前對日本交流的人脈關係，也具有知日的色彩，但受限於官方立場，個人的角色較不凸顯。

整體而言，日本基於其國內政治情勢及知識脈絡，對出版品問題有自身的想像與理由。中華民國政府希望透過出版品等文化議題，略為開放市場以示交流成果，目的仍在於宣傳與壯大反共力量。雙方在各自期待下促成了1950年代中期的談判，鬆動部分限制，但對彼此的需求也始終無法達成一致，使得日本出版品在解嚴之前一直未能取得全面性的進口管道。本研究顯示，中華民國政府對日本文化的態度並非全然鐵板一塊，在更高的國家戰略下仍有調整空間，但談判過程顯示雙方看待文化交流仍有濃厚的工具性質，此態度導致進口幅度隨外交關係起伏難以再擴大，也對戰後臺灣的文化風景產生深刻影響。

## 徵引書目

### 一、檔案

- 《中行廬經世資料》（臺北，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  
〈張羣先生日記（九）〉。
- 《外交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案（第一、二、五冊）〉。  
〈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訪華（一）、（二）、（三）〉。
- 《外交部》（臺北，國史館藏）  
〈日文書刊進口〉。  
〈對日本外交（四）〉。
- 《矢部貞治關係文書》（東京，（日本）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圖書館藏）
- 《行政院》（臺北，行政院藏）  
〈教育部外文書刊小組工作辦法〉。
- 《省級機關檔案》（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日文書刊電影管制辦法〉。  
〈新聞雜誌管制〉。
- 《戰後外交記錄》（東京，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文化外交に関する懇談会關係〉。  
〈日本各界中華民國親善團關係石井光次郎團長（一九五六・八）〉。  
〈本邦諸外国間著作権關係雜件第一卷〉。
- 《會議紀錄》（臺北，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  
〈中國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常務委員會第303次會議紀錄〉。
- 《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臺灣省臨時省議會檔案〉。
-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對日外交（四）〉。  
〈總統蔣公影輯一接見外賓（六）〉。

## 二、史料彙編

-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決議案彙編》。臺北：中央委員會秘書處，1952年。
- 百年史資料集編集委員會編，《拓殖大学百年史 資料編五》。東京：拓殖大學，2007年。
- 蕭李居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余登發案史料彙編（一）》。臺北：國史館、文建會，2008年。

## 三、文集、日記、回憶錄

- 大宅壯一，《大宅壯一選集》。東京：筑摩書房，1959年。
- 矢次一夫，《わが浪人外交を語る》。東京：東洋經濟新報，1973年。
- 矢部貞治，《矢部貞治日記 紅葉の巻》。東京：讀賣新聞社，1975年。
- 石井光次郎，《回想八十八年》。東京：カルチャー出版社，1976年。
- 中國文化大學張其昀先生紀念文集編纂委員會編，《張其昀先生紀念文集》。臺北：華岡印刷廠，1986年。

## 四、公報、報紙、雜誌

- 《出版文化国際交流会会報》，東京，1956年。
- 《海外事情》，東京，1955-1957、1959、1962年。
- 《新國策》，東京，1955-1956年。
- 《臺灣省政府公報》，臺北，1949-1951年。
- 《讀賣新聞夕刊》，東京，1956年。

## 五、專書

- 川島真等著，高村繁、黃偉修譯，《台日關係史 1945-2020》。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21年。
- 中北浩爾，《一九五五年体制の成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4年。



- 中北浩爾，《自民党政治の変容》。東京：NHK出版，2014年。
- 井上正也，《日中国交正常化の政治史》。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會，2010年。
- 出版文化國際交流會50年史編集委員會編，《出版文化国際交流会50年史》。東京：出版文化國際交流會，2003年。
- 北岡伸一，《自民党 政権党の38年》。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4年。
- 司馬桑敦，《中日關係二十五年》。臺北：聯經出版社，1978年。
- 李衣雲，《台湾における「日本」イメージの変化、1945－2003 「哈日現象」の展開について》。東京：三元社，2017年。
- 拓殖大學六十年史編纂委員會編，《拓殖大学六十年史》。東京：拓殖大學六十年史編纂委員會，1960年。
- 拓殖大學創立百年史編纂室編，《東洋文化協会五十年史稿》。東京：拓殖大學，2011年。
- 隅谷三喜男、劉進慶、涂照彥，《台湾の經濟 典型の光と影》。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5年。
- 廖鴻綺，《貿易與政治：臺日間的貿易外交（1950-1961）》。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年。
- 橋本文男，《昭和史を動かす男・矢次一夫》。東京：山手書房，1980年。
- 薛化元總編，《臺灣貿易史》。臺北：外貿協會，2008年。

## 六、期刊論文、專書論文

- 池井優，〈日華協力委員会：戦後日台関係の一考察〉，《法學研究：法律・政治・社會》，第53卷第2期（1980年2月）。
- 何義麟，〈戰後臺灣禁用日文政策之變遷——以印刷媒體之管理政策與中心〉，收入古川ちかし、林珍雪、川口隆行編著，《日本語在臺灣・韓國・沖繩做了什麼？》。臺北：致良出版社，2008年。
- 坪内隆彦，〈理事会関係文書に見る国際貢献—昭和二六（一九五一）年~平成一二（二〇〇〇）年まで—〉，《拓殖百年史研究》，第9期（東京，2002年3月）。
- 林果顯，〈「欲迎還拒」：戰後臺灣日臺出版品進口管制體系的建立（1945-1972）〉，《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45期（2016年5月）。

林雅行，〈監獄部屋から目覚めた「怪物－矢次一夫」〉，《政界》，第20卷第4期（東京，1998年4月）。

洪紹洋，〈中日合作策進會對臺灣經濟計畫之促進與發展（1957-1972）〉，《臺灣文獻》，第63卷第3期（2012年9月）。

洪紹洋，〈戰後臺日交流下的中日文化經濟協會（1952-1972）〉，《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63期（2017年4月）。

草野文男，〈「新生亞細亞」より「海外事情」へ 本誌の改題と發展〉，《新生亞細亞》，第3卷第9期（東京，1955年9月）。

陳棠，〈陳雪屏先生事略〉，《國史館館刊復刊》，第27期（1999年12月）。

鍾淑敏，〈戰後日本臺灣協會的重建〉，收入許雪姬主編，《臺灣歷史的多元傳承與鑲嵌》。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4年。

## 七、學位論文

徐年生，〈戰後日本の中国政策の模索と日華関係の研究：1950年代を中心に〉。札幌：北海道大學法學研究科博士論文，2007年。

新井雄，〈日本自由民主黨友台派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4年。

## 八、網路資料

〈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之議定書〉，收入「全國法規資料庫」：<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Y0010076>（2021/8/31點閱）。

〈石井光次郎關係文書〉，收入「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https://rnavi.ndl.go.jp/kensei/entry/ishiimitsujirou.php>（2019/8/31日點閱）

何義麟，〈臺灣協會〉，收入「文化部臺灣大百科全書」：<http://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5820>（2019/8/31點閱）。

〈御手洗辰雄〉，收入「ブリタニカ国際大百科事典 小項目事典」：<https://kotobank.jp/dictionary/britannica/2083/>（2021/8/22點閱）。

〈陳雪屏〉，收入「中華民國政府官職資料庫」：<http://gpost.lib.nccu.edu.tw/display.php?&q=name:陳雪屏>（2021/8/23點閱）。